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4月15日第7期

总第15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王爱和作品：《田园》，纸上油画，玉渊潭，1973，15cm × 21.7cm

## 《记忆》153期

### 目录

#### 【专稿】

燕子（日本） 竹内实：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

#### 【无名】

作品 藤萝春（油画 中山公园 王爱和）

王爱和 无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和团体无名

#### 【评论】

丁东 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

不平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二）

#### 【大饥荒】

陆凌 一九六零年(五)——大饥荒对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影响

#### 【述往】

陈仁德 陈乐生“枪杀红卫兵”事件

王复强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二）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五）——苏北农场（下）

#### 【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30日）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5日）

#### 【读者来信】

1. 孟繁华纠错      2. 聂树人回应肖文正      3. 聂树人回应七尺从天

#### 【本刊声明】

## 【专稿】



## 作者简介

刘燕子，湖南长沙人。大阪市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关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关西大学。文学研究者，中日双语的写作者、翻译者。研究方向：文革文学及文化思想。1999年与留日同仁创办中日双语文学刊物《蓝·BLUE》。有中日文著作多种。代表作：《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黄翔的诗与诗想》；日文译著：《中国底层访谈录》；中文译著：《没有墓碑的草原》（与父亲合译 2014年台湾八旗出版社）；启之《内蒙文革中的“挖肃”运动——原因、过程及影响》（岩波书店《思想》2016年元月号）等。

竹内实：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sup>1</sup>

燕子（日本）

## 竹内实先生的私淑弟子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打开计算机，“燕子女史，您或许已得知竹内实先生于昨夜溘然去逝”。来自关西中日恳谈会原田修先生的几行字跳入眼帘。上个月竹内先生九十岁生日，俺还给先生邮寄了一张九岁小男孩手工制作的贺卡，“嘿，同学，恭喜恭喜，俺俩满九岁啦”，开封即拉出个彩笔立体九层高楼纸蛋糕。

“先生那么大的学问家，太失礼了吧”，刘帮兄一脸日本式的毕恭毕敬。“亏得只有燕

<sup>1</sup> 竹内实（1923—2013）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北京日本学中心主任教授，以及日本的松阪大学、关西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代表作有《毛泽东：诗与人生》（1965）、《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魅力源泉》（1972）、《毛泽东》（1989）、《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99）等。主编《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先后获得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

子想得出这号鬼头精主意，”先生在电话里孩子般笑了，声音遥远但似乎还硬朗。

先生走了，回到天上。再没有机会牵着老人家的手去梅田喝咖啡，吃冰激凌了；再没有机会听他那字正腔圆的北京官话谈中日问题，文坛轶事了。呜呼痛哉！这些天俺在心里反复念着几句诗：“一个孩子在天上，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一个孩子在天上，像趴在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画纸。一个孩子在天上，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

竹内实先生是日本战后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程麻先生花费十年光阴，从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中选译成的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从书名中可窥见先生学术之精华。

先生一九二三年出生于山东省的张店，今天的淄博市。十八岁才回到日本念大学。他告诉我：“在日本出生的汉学家，很明白自己的学术终点在哪里。我从中国回到日本后，中国仍是我梦魂牵绕之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日本，我深感这种差距和孤独。”

直到晚年，先生还常常唠叨：“要是生活在中国乡村的某个集镇就好了，能听到赶集汉子挣着脖子的吆喝声，车马驴欢叫，能看到穿着粗蓝布女人、孩儿们健壮的笑脸。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有时一个人发闷，我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我终于想通了，我是中国人。只不过打了一个趑趄，让我生活在日本罢了。”

程麻先生说，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称自己是中国的老乡，不怕被本国人讥笑，就像阔人认了穷亲戚一样。然而，就是这种“老乡”缘分，使得先生终身执着于观察与研究中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大实话，那么通俗，那么贴切，又是那么真实的悲喜交加。

俺是个糊涂虫，大脑常常处于“月朦胧，鸟朦胧”的状态。在刚刚认识先生的那些年，俺老远就开叫“竹内好先生”，先生总是微笑着纠正，“我叫竹内实”。一字之差，都是日本知识界的两位高人。

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现代评论家和思想家，编写过四十四种《鲁迅》，并提出“近代的超克”这一著名的政治文化论题，此后被称为“竹内鲁迅”。俺这么瞎咋呼，换了别人，以为俺捉弄竹内实先生，但先生乐呵呵：“竹子里面是空心的，我肚子也没真才实学，应该叫‘竹内虚’才对。”所以，先生取“虚平”为字。每当有“好、实”不分的好事者问，“那您是竹内好先生的亲戚啰？”先生总是风趣地回答说：“阿Q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自认起亲戚来，称他与赵太爷原是本家，结果红脸涨筋的赵太爷不但刷了阿Q一个嘴巴，而且喝骂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不过，好先生不会刷‘实先生’一个嘴巴”。

先生是俺三本日文拙著的监修者。可以说，若没有先生，俺这样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者也不会走上用日文写作，并将中文翻译为日文的道路。

俺非先生的“直弟子”，至今也不敢妄称为“弟子”。千禧年俺与秦岚等留日朋友创刊中日双语文学刊物《蓝》时，先生不吝赐稿，因而结缘。《蓝》休刊，俺悲催纠结，先生鼓励俺“做单干户，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耄耋之年的他不惜精力，一笔一划地校对俺的日文，红笔修改，铅笔质疑，密密麻麻，十几年来往书信和修改稿达数尺之高。先生学术态度严谨，研究方法缜密扎实，为人低调谦逊，不卑不亢，不像有些学霸圈地画牢，弟子成群，前呼后拥，“手一指，人马死”。先生卓然独立，永不随波逐流，他赠与《蓝》江户时期的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几句话，俺终身受益。

少而学则壮而有为

壮而学则老而不死

老而学则死而不朽

### 日本知识界的文革批评者

早在一九六〇年，竹内实先生随同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上海，见到过毛泽东、周恩来。毛还特意赞扬过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文革爆发，日本也跟着发红烧，抽红

疯。一九六八年，日本以日大、东大、京大等为首，全国各大学的“全共斗”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武斗涨至高峰期。东大正门张贴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标语。神田一带被称为“解放区”，设筑街垒、路障，准备了投石等简易武器的年轻人同防暴警察决死一战。

无疑，文革也引起了一场日本知识人的心灵地震，折射着知识群体艰难的精神轨迹，对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广泛而深远。

颂赞派占据主流，作家高桥和己认为文革是劳动与知识一体化的人类未曾有的大实验。为亲身体会文革，高桥一九六七年作为《朝日周刊》的特派员平生第一次访华也是最后一次访华。“在首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热气腾腾的欢呼声中，他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敬意进而产生对中国人民产生敬意之情，高桥热切地赞扬文革“其政治的顶峰为与人民大众的奇妙的合作而成为前人未踏的第二革命。”

少数文革批评派，主要是站在国际地政学的现实政治论立场。中嶋岭雄与桑原寿二为代表以及和一些平时极少在论坛露脸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

日本的“革命派”想当然地将竹内先生划分为“文革礼赞派”。但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对盲目的革命激情冷眼旁观，独自站出来与主流唱反调，质疑并反对文革，拒绝了四十多家请写赞美文革的约稿。当然，他质疑文革的文章也被四十多家刊物拒载。革命狂潮一片红中的日本，与文革唱反调，如同军国主义时代反战一样，被认为是“非国民”，对“异数”，日本社会浸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惩罚，先生自然受到所谓“革命者”的威胁与讥诮。

程麻先生说：“文革期间，竹内以对中国文化独到的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这个独到见解来自先生自身的中国生活经验。先生曾多次聊及文革以及文革与日本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八月，日本媒体报导了北京红卫兵在王府井闹革命，毁坏“全聚德”老招牌的消息，还刊登了照片。

这时，我心里就更清楚了文革的概念。

这幅照片将我拉回到少年时期在山东小镇看到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小时候脊背骨有病，卷着石膏，但穿上厚衣服就看不出来。因我是个日本孩子，中国小孩常常恶作剧，把我围在中间，起哄，打闹，掷石块。他们扔的小石头碰到我的背上就啪地被反弹回去。孩子们很害怕，哗啦一下子作鸟兽散。

我想起那段生活小事，就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红卫兵》发表在《新日本文学》杂志上。嘿，十来岁的孩子起来“造反、革命”，未免滑稽。鲁迅也说过，“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当时日本知识界大都从思想意识形态上理解和判断文革，直接暴力行为只能证明文化血脉上中国还处在近代野蛮社会，还有人认为，中国反苏共意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但总的来说日本赞颂文革、唱和同调者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总归是喜欢反对老年人、反对权威的。

我并非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而对中国感兴趣。我出生在中国，所以怀念中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底层人民生活改善而高兴，但就“牛鬼蛇神”这一名词其自身的民族色彩而言，地道地暴露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侧面。而且文革前，我与老舍、赵树理都见过，他们都被打倒，与人之常情，道义信礼相悖。可是在礼赞日本人眼里，一夜间我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 宁做“政治黑类”，不当变色龙

竹内实先生从文革初期对吴晗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中，洞察出自一九四九年后已初见端倪的虚无主义文化态度，结合自己对近代以来动荡不安历史的亲身感受，他很快写出了像《中国文艺界陷于混乱和虚无》和《“牛鬼蛇神”及其他》那样冷静思考的文字。伴随着后来不断复杂多变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情况，先生进而深入到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文革中那种草木皆兵的极“左”狂潮。

《文革观察》是先生著作中最“难产”的一本，在这本书里先生记叙了“日本战后历史上，新中国与旧中国是决裂的”，新中国沸腾的形象，最初出现在一九五三年三月的舞鹤港。这些战后对新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头戴列宁帽，身穿人民服的日本侨民回到日本，他们带来了新中国欣欣向荣、健康质朴正面消息，轰动了全日本。但文革粉碎了人们心目中的新中国的夸张的神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日本媒体快讯报导北京市长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中共领导人被红卫兵小将五花大绑批斗的消息，清楚地展示了文革暴力，尽管没有什么文字或理论，也不需要文字或理论了。这张象征性图片粉碎了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夸张现实”。尽管那个中国形象掺杂了日本人自身天真的想像。文革，成为转变日本人关于中国的印象的重大事件。可以说，他们在幻灭的悲哀中，接受了中国“令人扫兴的现实”。

竹内实先生谈了对文革的认识，以及他在日本中国学界的遭遇：

战后日本人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关注，仍然暗藏某种似乎战时天皇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印象中，天皇制思想的信仰对象，在战争时期是天皇，而战后变成共产党，后来由于中苏对立，又在共产党中演变为只有中国共产党。

对文革及其理论的最大幻灭来自林彪的垮台。文革刚刚开始时，我还没有对文革泼冷水，因为我对文革还没有理解清楚，刚刚开始，谁又能理解清楚呢。神话化我。当时人们对我的既定俗成的认识是：竹内实肯定是毛泽东派。但是作为毛派，却不站出来表示赞同文革，为什么？竹内早在一九六〇年就受到毛的接见，得到毛赏识的人，应该感恩戴德赞美毛了。但我并没有要求同毛会面，见不见我们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并不知道。

另外，我对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也发表了批评文章。这些都成为我的“罪状”，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我就被贴上了“非友好人士”的政治标签，在日本被划为另一种“政治黑类”，从一九六〇年见毛、周这之后，到一九七九年参加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团的一共十九年间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问题研究者



的我来说，等于失去了“中国”这个田野调查的现场。

日本的“现代中国学会”，每年开一次全国学会，学者发表研究报告。记得有一年，一位姓N的年轻学者发表报告，极力赞美北京景山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文的所谓“早期教育”，可是第二年开始刘少奇批判，教育方针也变了一百八十度，那么N君脑子转得快，马上跟风，发表了批判刘少奇的论文。以后我就不大愿意参加这个学会了。甚至一直不参加任何所谓“学会”了。比起日本的所谓革命家，中国的反革命要好得多。

文革时期，我很孤立。但对中国大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仍然一厢情怀，惺惺相惜。

孤立无援中，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即：一、以后我依靠铭刻在我心里的中国为研究对象。二、以后我的研究在书桌上进行。三、哪里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从那以后，我豁然开朗，心安意宁了。想什么就写什么的，内心无愧，文责自负，不当变色龙。

日本与中国“友好”或者“不友好”其实不重要，或者说没那么重要，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内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语言表达方式的理解更重要，小圈子，小团体和个人层面上的舒筋活络，血脉相通更重要。

### 竹内实提议：出一本日本学者研究毛的书

二〇〇八年，程麻先生受中国某出版社的委托编辑两册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竹内实先生的研究自成一册，另外选择几位日本代表性研究者的著作选译合为一册。先生兴致勃勃，不顾已过伞寿高龄，亲自选题，提议择定三人：新岛淳良、竹内好、中西功，不但亲自起草与日本出版社的联系蓝本，还寄来一九八六年中共编译局内部发行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的复印本。

当初俺并不看好这本书的出版，理由很简单，作为中国言论自由和译介外国理论的黄金年代，八十年代早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俺不敢拂先生之热心和诚意，也想通过本书的翻译出版，围绕中国认识问题，摸索战后日本知识人精神脉络。而先生推荐的新岛淳良是

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为文革与日本学生运动相互关联的理论考察中，在日本公共论坛中登场次数最多、最有影响力和最受人瞩目的理论家。新岛甚至试图将文革的公社的概念和体制移植到日本，掀起日本的文化革命。

他的文革理论直接影响着学潮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岛的政治乌托邦是“公社国家论”，林彪之死，浅间山庄事件之后，日本左翼革命派失去民心 and 道德的制高点，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 新岛淳良：一个被文革革了命的学者

一九七三年，新岛出于思想的洁癖，追求知识人当吹鼓手的自我责任。主动向早稻田大学提出辞职。一个叫“山岸会”的共产式供给体制共同体出现在新岛面前。他将所藏书籍全部义卖，捐献给他心中的毛理想公社。自愿“下放”到位于三重县伊贺町山岸会，掀起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在劳动中，新岛不断反省，自我批评，认识到自我想像的毛主义公社的乌托邦与现实的出入，坦白和内疚自己目睹红卫兵的暴力造反，相互残杀，警觉到乌托邦的暗黑一面，但还鼓吹文革的积极意义，误导舆论。新岛向自己的信仰举起锋利的手术刀。新岛在山岸会又经历了退出和再加入的反复历程，最终他认为山岸会“没有变质为极权主义”。二〇〇二年去世后葬于山岸会共同公墓。

毛的乌托邦复活了日本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期待和诉求。只是他们经历的是精神痛苦，而中国人却经历了几千万无辜生命的痛失和对文化理想，道义尊严的沦陷。

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礼赞派几乎都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立场，都轻而易举地摒弃了自己的言论责任，他们忘记了那些高分贝语言杀人的潜威力。海因里希伯说：“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那些负责引导和诠释语言的“论者、公知”们，那些手持麦克风，垄断话语霸权，挟持语言，给语言注射吗啡的人，使得语言产生毒瘾的人，有多少进行过自我解剖和坦承责任呢？

新岛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耿直得透明，实诚得不会耍花招，不会变换一件马甲，他的生存智慧似乎不高，处世策略也不精明，好像也不熟谙“学术和理论”的游戏规则，如果他继续保留名牌大学教授的位置，仍然可以独占资源的优势继续在“学术”空间里自娱自乐，甚至拉帮结派，培养门阀，陶醉于无聊的学术应酬和吹捧，文革后照样可以在酒饱饭足后进行“中日友好”，从利益共同体中分得一杯“共同项目、学术交流”之残羹，然后对中国的痛苦做做俯卧撑，玩玩躲猫猫之类的游戏。

然而新岛固守了内心的价值选择，他理想的挫折和自省，他行动的诚恳和执着，可视为日本知识人战后思想谱系的一个重要坐标。他自愿把自己置身于固有的主流秩序之外，并暴露自己的笨拙和伤痛，以“圈外人”、“边缘人”的身份发声并实践着。

晚年的新岛曾自讽为是“被文革革了命的人”。退出公共论坛后，先后创办了三份个人小刊：《呐喊》、《彷徨》、《坟》。分别代表他晚年的三种心态。据访问过新岛的遗孀新岛里子女史的蒋同学说，里子女史得知其夫的论著将被译成中文，十分欣慰。“他（新岛）生前太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了，以致被这种热爱冲昏了头脑。作为学者，他也许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位诚挚的日本人，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希望中文读者能够透过他的文字来了解一位真实的新岛淳良。”

新岛精神坦诚，但他的毛思想研究，并不符合俺的思路，也不合时宜，当然更不代表俺的表述。他山之石，倒是给当代中日两国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使我们得以拓宽视野，更加宽容地进行学术研究。新岛作为知识人的独立之信念，自由之精神，责任之清算，也同样拷问我们的天良和底线。

## 出版社拒绝出书

青灯治史，孜孜不倦的蒋同学，也欣然接受竹内实先生之托，翻译一位叫中西功的传奇式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大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俺们在奔波教学之余，吭哧吭哧

译出几十万文字，多番周折，等来的却是中国出版社斩钉截铁的拒绝：“书稿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对毛泽东的评价有失公允，学术观点有偏颇，论证材料缺乏权威性。不建议出版。”

毛冥诞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红宝书”一类裹脚布又被捧出来，而来自邻国至深至切的挣扎痛喊，却被割了喉咙。

竹内实先生曾在《组织与现实感》中写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一步步从“文学的组织”向“组织的文学”发展。在中国，傲立于“组织”之上的作家和批评家，可能没有了。这里，将“文学”换成“言论自由”也未尝不可。

“中国人说‘没法子’就是‘有法子’，山穷水尽必有路。”但愿如此吧。先生，别挂心了，一路走好，歇息吧。■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酷暑中的大阪

【无名】



王爱和作品：藤萝春，纸上油画，中山公园，1973，26.7cm × 19.2cm

## 无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和团体<sup>1</sup>

王爱和

1979年7月7日，无名画会在北京北海公园首次公开展览。数月前，“新春画展”和“四月影展”在北京开幕，上海办了“十二人画展”。数月后，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外举行露天展览，更多的展览在其他城市举办。这些非官方艺术展览，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宣告艺术已突破政治的长期奴役。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1979年值“民主墙”被禁，公众的表达由政治转向文化领域。这些展览是80年代“文化热”的前奏，<sup>2</sup>标志一个泛政治时代的终结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苏醒。

无名画集十三卷讲述着一个故事，即独立艺术如何在草根下生成，涓滴凝聚，涌而成溪，溪川成势，最终改变了历史的地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但可由此窥见莫测的海下那庞大的文化现象。这个故事讲的是艺术，也讲产生艺术的那个团体——其凝聚力、其生存条件和共同努力。本文不评价无名的艺术成就，而是为它产生的历史条件、过程和方式提供一些线索。

“无名”和“四月”、“星星”一样，都是为办展览而现起的名字。但名字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无名”不标志一个团体在筹展时诞生，如“新春”或“四月”；也不宣告燃起“今天”之“星星”以志明日之燎原。“无名”是一个回顾性的描述，描述一条漫长曲折之路。在严禁结社的年代，这个团体只可能是无名、无形、自发、自然，没有章程、没有会员制度，没有统一的艺术理念及绘画风格。所有的只是年复一年的集体艺术实践；实践将我们系为一体，成为每个人每一天存在的中心。因此，在1979年，我们发现没有名字可以

<sup>1</sup> 此文是为《无名画集》所作的序言，发表于《无名画集》（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第1-13卷，5-6。

<sup>2</sup>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描述这个无形而多层面的集体。简言之，“无名”不是东方哲学的抽象，不是前卫艺术的宣言，而是对一些平凡生命具体存在的描述。

##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来自两代人、不同的社会背景、各种工作职业、和几个朋友圈子。年长的一代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生于1949年以前；家庭出身都不好；都报考美术院校落榜、其后自学绘画。赵文量（1937年生）、张达安（1941年生）、杨雨澍（1944年生）和石振宇（1946年生）四人先后入私立熙化美术补习学校并在此相遇，1962年后常在一起画画。赵文量曾在苏联油画展上临摹原作，他创作的《同学肖像》入选北京市画展。但政治压力开始加码。1960年，杨雨澍因出身问题被迫去白虎涧采石场准劳改两年。1964年，社教运动深入，闲散“社会青年”必须安排工作。石振宇入工厂学徒，张达安去永乐店农场务农，赵文量、杨雨澍去黑龙江农场不成后被分配到工厂做工。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sup>1</sup>1966年，杨和石的家被抄，杨全家遣返农村，赵的父母回东北老家。经过45天在红色恐怖中的隔离，赵、杨、石三人再次相聚，互相支持，坚持绘画。他们将画箱改小，藏在书包内，在休息日去远郊写生。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题材由室内的静物、人像改为户外风景为主，画幅变小。艺术成了他们生命的支柱，大自然成了他们的画室，在社会底层他们创造着独立的艺术。

风暴中，一代年轻人长起来了。1966年我们在学校目睹打老师、砸教室，在家看抄家烧照片书画。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无论是被红卫兵打死祖母的张伟，还是革命干部的女儿杜霞，一律下乡插队。次年，郑子钢去黑龙江农场，1970年马可鲁平谷插队。1972年田淑英赶上插队末班车。<sup>2</sup>高中废除，大学关闭。父母下放，郑子燕、刘是、王爱和各守

<sup>1</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2-131.

<sup>2</sup> 1967至1979，共16,470,000知青上山下乡，人数超过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见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p. 251-2; and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空巢。<sup>1</sup>成长为人所必须的社会纽带全部破裂，知识的源泉干涸，学校、家庭、社区支离破碎，暴力横行，宣传充耳，没有图书、电影、音乐，也没有榜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何以超脱“动物凶猛”成长为人？<sup>2</sup>在史无前例的教育废墟和文化荒野中流浪五年，我们到了十六、七岁，被分配作工人、农民、厨师、幼儿园阿姨……成为群众社会的沙砾，混入水泥，去浇筑共产主义的大厦。<sup>3</sup>此时，我们有幸抓到一支画笔，绘画成为我们创造自我的主要行动。没有院校画展，我们的艺术启蒙来自巨大的宣传机器。政治宣传发动了无数工农兵写作组、宣传队、创作组，生产了铺天盖地的批判稿、样板戏、主席像、宣传画。<sup>4</sup>据马可鲁回忆，他第一次感到油画的震撼，正是看韦海在学校操场整面墙上画巨大的宣传画。

权力总是在自身机体内产生反叛权力的抗体。年长的三位在工厂画主席像，因而获得颜料和画布，得以在下班后实践自己的艺术。年轻的也在学校、工厂搞宣传，由此产生的反叛令他们转而探求独立的艺术。画画，画出一个与四周宣传不同的世界，用以突破宣传的包围，用以建树独立自觉的人格；这不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反抗，而更多的是一种本能。要超越群众社会的沙砾，我们先要改变如何看世界。

## 我们如何相遇？

同一历史条件不仅使艺术成为我们生命之必需，也使团体的出现成为必然。艺术是社会行为，没有艺术可以在孤立隔绝中产生。当正常的公共空间不存在时，我们更需要小团体内部的亚公共空间。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一下乡下放、抄书禁书、宣传、分配，——提供了我们聚合的资源、地点、和向心力。文化部宿舍大院里，有八间库房锁着抄禁的图书。史习习和郑子钢多次夜盗，盗出数麻袋的书籍画册。这些书开始流传，吸引了众多饥渴的

<sup>1</sup> 从1968年开始，70%至90%各部委的职员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在边远农村接受再教育。见 MacFa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160; 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杨绛, 《干校六记》。

<sup>2</sup>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描写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经历了本文讨论的同一历史条件。

<sup>3</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et al.: Harcourt Inc., 1968), pp. 305-326.

<sup>4</sup> Stefan R. Landsberger, "The Deification of Mao: Religious Imagery and Practi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yond," i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ed. Woei Lien Chong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pp. 139-184; p. 147.



心灵。这个叫203大院的宿舍，住着许多像习习这样父母下放的青少年，因而相对自由。1972年习习遇马可鲁，马带来老同学韦海、新朋友张伟，张伟带来李珊。1973年，郑子燕在文化宫画游园彩车，遇到在那里上工人业余美术班的王爱和。刘是、邵小刚、马可鲁在脱产搞宣传时相遇。1973年秋，习习带赵文量、杨雨澍、石振宇到203大院，两代人、几个朋友圈子合而为一。

1973年秋，时值林彪事件后的短暂解冻再遇严冬，怀疑“文革”的种种读书会、地下沙龙在萌芽中惨遭霜冻。<sup>1</sup>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批右倾回潮、批林批孔，掀起了“二次革命”。新工人民兵诞生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sup>2</sup>这样的环境使团体牢牢凝聚。它提供了我们仅有的社会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交换思想、传阅禁书画册，共同实验现代艺术。在“批判无标题音乐”运动中，我们围在老唱机旁，偷听贝多芬。我们去看黑画展，企图发现我们的联盟。<sup>3</sup>团体凝聚的最重要标志是1974-1975年冬的地下画展。<sup>4</sup>地点选在张伟家，因为那幢苏俄式大楼，漆黑的走廊较容易躲过街道委员会的监视，更因为张伟的母亲勇敢地接纳了我们。我们先把画藏在大衣里分批运到摆好。那天两间屋挤满了十几人。至今没有人清楚记得参展都有哪些画，但人人都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振奋。许多人把这次展览看作是加入地下团体的洗礼。

## 我们如何作画？

我们每月工资在十六至四十几元之间，没有画室也没钱买颜料画布。我们绝大部分的油画是画在纸上，从二毛五分钱一开的素描纸到七毛五分的水彩纸，上面涂上骨胶或立德

---

<sup>1</sup> Song Yongyi, "A Glance at the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 no. 51 (May, 2007), pp. 325-333; MacFa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p. 352-4.

<sup>2</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7), pp. 110-185. For contrast with the first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Carma Hinton, Geremie Barmé, and Richard Gordon, *The Morning Sun: A Documentary Film*, 2003; and Jonathan Ung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57 (January 2007), pp. 109-137.

<sup>3</sup> Ellen Johnston Laing,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sup>4</sup> 这次地下展览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根据我多次采访，参展艺术家们公认是在一个新年的公共假期举行的。有三个可能的日期：1974年一月一日，1974年12月31日，1975年一月一日。

粉。大家常合伙刷出一批纸，分而画之。有时谁找到一批废弃的包装盒，如获至宝，也拿来分享。石振宇最有本事，能把画主席像的颜料画布顺出来，让三位老将画一些大幅布上油画。但我们早期的绝大部分作品是 A4 纸大小的纸上油画。

画幅小是无名的一个特点，但却非我们的美学追求。它不但受制于物质条件，更取决于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时空结构。我们每周六天劳作，每天八小时工作加两小时政治学习，能作画的时间只有每周一天休息日和每天下班的几小时。多数人都上倒班，为节能所设的轮体制令我们不能在同一天休息。定时的聚会和长期作画都成为不可能。自然而然我们学会知道何时何地可以找到大家，上班把画箱藏在包里，下班就奔那个地方去。有时去某某家，画人像静物，临摹画册，从伦勃朗到梵高、塞尚、毕加索、表现主义、野兽派一概不拒。我们也看中国画，黄公望的雪景、倪瓚的山林，金农的梅花、八大的枯荷；文人画的美学意境滋养着我们去创新。

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居室，街道委员会看得又紧。所以一般我们在户外作画并相聚。最常去的是玉渊潭：一条河，两岸伸着白桦林和荒草地，三面环着农田。那里荒野无人，最接近我们想象中的“自然”。在这里我们画不尽落日、河流、农舍、山林。此外，我们追着春天到植物园画丁香，到后山画桃花；夏天画紫竹院的柳岸荷塘。郊外的香山、八大处、颐和园、十三陵，市内的故宫、天坛、文化宫、北海，都是我们作画的场所。上班的六天，我们在下班路上画街道、胡同，天黑了就画夜景。在被革命现代化遗弃的古迹上，我们与文化传统相连；在工业化都市的夹缝和周边，我们寻找大自然。

寻找大自然，我们集体远游，最重要的一次是十三人去北戴河画海。1975年十一国庆，我们得公假三天外加个周末。有人伪造了一张介绍信，以此我们通过了工人民兵的盘查住进招待所。有人拿不出二十几元买火车票，习习替杨雨澍付票钱；张伟、李珊则晚走一天，等我们把用过的票寄来，改改再用。招待所床位九毛钱一晚，馒头二毛五一斤，大家凑钱买馒头，分享杨雨澍带来的一大罐咸菜，开始了四天的乌托邦公社。张伟、李珊第二天到达，当晚即遭工人民兵盘问并责令次日离开。次日天不亮，大队人马去鸽子窝画日出，小

队人马等食堂开门为大家买馒头。两路人马走差了道，大队人马饿了一天。最后一天我们直画到天擦黑。习习吟诵普希金《致大海》，含泪挥别“自由的元素”，我们跑向车站。等火车时，刘因“形迹可疑”被抓，石振宇使出浑身解术将他赎出。

## 我们画什么？

我们的画大多为风景：山水、落日、月光、树木。为什么画月光、树木？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成为严格的形式教条，统治着一切文化领域。绘画题材必须是人物画，主题必须是革命，形象必须是“高、大、全”的工农兵典型，形式必须是“红、光、亮”。红色象征革命，黑色则暴露画家的反革命意识。<sup>1</sup>风景只能作革命形象的背景，作人定胜天的战场。1974年“黑画展”大肆批判那些用黑色画风景动物，因而违背了这些形式教条的画家们，引发了“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sup>2</sup>戏剧界，历史剧《三上桃峰》遭到批判。<sup>3</sup>同年，文化部长带头批判无标题音乐，指其为“为资产阶级夺权掌权制造舆论的工具”；而那些以“月光”、“泉水”、“松树”为题的音乐则同样是掩盖资产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和病态情感的面具。<sup>4</sup>正如布莱克特(Brecht)所描述，在这样的时代，“言树木几乎是犯罪”。<sup>5</sup>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画树。

树木、风景不仅提供了正统之外的艺术题材，而且帮助艺术家塑造体制之外的自觉主体。我们在风景中找到自由空间，想尽办法从体制的齿缝中挤出时间，在风景中投射我们的理想、创造不同于现状的新的现实，并同时创造自己。画，记录了这种过程，数百张画，把日复一日零碎的经验连成一个延续的整体，这种延续形成“存在的力量”。<sup>6</sup>这是一个想

<sup>1</sup> Landsberger, “The Deification of Mao;” and Julia F.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360.

<sup>2</sup>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160; and Laing, *Winking Owl*.

<sup>3</sup> Richard Kraus, “Arts Polic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e Minister Yu Huiyo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s.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pp. 219-42; p. 229.

<sup>4</sup> 转引自 Kraus, “Arts Policies,” pp. 230-31.

<sup>5</sup> 转引自 Nadine Gordimer: *Living in Hope and History: Notes from Our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 203.

<sup>6</sup> Gordimer, *Living in Hope*, p. 198.

象和创造的过程，而非反映或描绘现实。在一个视自然为斗争对象的时代，我们在自然中找到自己，也重新确定了人对自然崇敬的关系。

我们也画人物、静物。在人像中我们挖掘人性的相通和人的尊严，尽管每人画人像多少不等，形式各异。这些人物静物虽然数量不多，却是无名的珍品。它们见证我们不懈的人文关怀、对社会的参与而非漠视或逃避。这些人物画的反叛力量在1979年公开展览时可见一斑。当时正是人物画引起最大争议，有几张被美协要求撤除，多亏美协副主席刘迅先生的坚决抵制，才得以公开面世。

## 反思无名

与插队学生的读书会、诗会不同，无名的组织构成特别多样，这种多样正是团体生命力所在。除家庭、职业和性别之差，两代人的组合尤为重要。1973年，无名的长者年龄在二十七至三十六岁之间。无名的青年晚生十五至二十年（1951—1957），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今天，有批评家提出有两位长者是无名的导师和灵魂人物，引起激烈争议。成员们公认最年长的赵文量最具影响力，他主动帮助别人克服绘画上的困难，他对艺术的执著感染了每个人。但多数人强烈感到，如果把无名定义成一群学生跟一两位老师学画则完全曲解了无名的真实性质。赵文量对大家的最大感召，是他坚信画不可能由他人教会（学他），而只能从心中发现自己（自学）。青年人敬重他，最根本是把他看作是反对一切权威的独立艺术家的榜样。正是为了共同的反叛、追求独立的自我，我们走到一起。

集体不是个人的总和或延伸，如生物体，它靠各部分相互依赖形成生命。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为团体的存在作出不可或缺贡献。年长者领队，传授宝贵的经验。年少者激励长者，令团体充满青春活力。老练机智者应付警察和街道，确保集体的安全。童稚者的纯真令人耳目一新。女画家以独特清新的感觉丰富了无名的艺术。勤学者带来《印象派画史》、《罗丹谈艺录》。雄辩者争论理念和政治。嗜文者传阅雨果、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好音

者分享贝多芬和德彪西。思辩者讨论尼采、萨特。善社交者将无名与外界联络，扩展了它的资源和机会。至关重要，是每一个人对集体的忠诚和友谊，创造了这个自由空间。在一起我们敢说犯忌的话，敢想叛逆的思想，实验离经叛道的艺术。在一起我们走过个人不可能单独逾越的距离。归根到底，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不自由时代的自由，是文化饥荒中的食粮，是无情社会中的友情。无名是我们追求真理、发展真我的空间，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在一个扼杀精神生活的世界，无名是我们创造的精神家园。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历史产生无名，也决定了它的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它遗传了封闭。缺乏信息令我们难以系统学习而依赖自发本能。没有公共空间令我们自省内心感觉多于关怀公众。反对外面的个人崇拜，我们崇拜自己的英雄。一旦意识到这些局限，每人都努力突破之。我们拒绝任何统一艺术理念；“为艺术而艺术”是争论的热点但不是信条。我们反对任何形式标准；一旦创造了共同的题材和画风，就开始创新个人风格。1977年“文革”结束后，集体整体活动渐由个人或三两个人的独立活动取代。1979年展览同时体现了集体的认同和个人风格的多样。1981年春为准备二展，几位成员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领导班子并拟定了“无名画会会员章程”和“会员名单”，这一重整组织的努力恰恰反映了团体的分裂。七月无名画会二展如期举行，其后自然解体。无名的存在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自由，它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 画集

画集共十三卷，十三位艺术家人各一卷，以姓氏拼音排序。每卷以无名时期作品为中心，展现个人艺术发展的全程。画家本人为画集选画、排序，并提供目录信息。每卷在本文之后刊登艺术家的自述文章，讲述个人和艺术创作的经历。无名的作品绝大多数未记时间未署名，目录中的作品年代多靠各人记忆而定。因而这些年代只应作某画家作品相对年代的参考，不可作横向比较的绝对年代。每位艺术家的成就有画为证，恕不赘言。画集未

能收录所有的参与无名活动的画家。1979年有二十二位画家参展，包括成员们的同事和朋友。史习习，无名的沙龙主人和重要成员，于2005年英年早逝。习习一生不满自己的作品，使之遗失几尽。出版之际，“遍插茱萸少一人”，令人伤怀，唯有在画集中珍藏对他的怀念。

无名有幸获众多朋友和支持者。艰难岁月，父母亲人分担我们的窘困，勇敢地打开家门接纳这个集体。很多朋友提供了珍贵的书籍画册。1979年，北京美协副主席刘迅先生刚出监狱，就担着风险全力支持无名画展，与极左势力做了艰苦斗争。刘海粟大师为展览书写“无名画会”匾额并在著作中评论无名作品。批评家高尔泰、栗宪庭，艺术家马建、朱金石等撰文介绍无名画会。美术史家高名潞策划“无名回顾展”并著专著研究无名。<sup>1</sup>美术史家孙志新为画册的出版给予宝贵建议。画册的出版获得多方资助，鸣谢另见画册版权页。这个名单不可能全，对所有朋友和支持者，我们在此深表谢意。为他们的期待，为纪念无名画会走出地下三十周年，我们谨献给公众这套画集。

2008年8月于香港

此文原载《无名画集》第7卷，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5-6。

<sup>1</sup> 朱金石，〈优美的旋〉，《读书》，（2007）7，33—38页；刘迅，〈因势利导，繁荣群众美术活动〉，《美术》，（1979）9，8—9页；马建，〈现代派艺术的开拓者——无名画会〉，《人生伴侣》，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6，24—32页；高名潞，《“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The No Name: A History of a Self-Exiled Avant-Garde），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高尔泰，〈“无名画展”印象记〉，《论美》，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04—107页；刘海粟，《齐鲁谈艺论》，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栗宪庭：〈再访赵文量和杨下雨澍〉，《新潮》（2001）8，73—78页。



【评论】

## 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

丁东

文革发生距今已经半个世纪，叙述文革史出现了多种专著，论文和回忆录。因为历史观和价值尺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叙述语境。周伦佐曾经列出五种思想和主题：

- 1、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
- 2、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 3、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
- 4、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
- 5、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

具体的叙述语境人言人殊，更为多样。本文只想选择影响较大的五种语境，即毛泽东语境、邓小平语境、落马高官语境、造反派语境、局外人语境，略作评述。

毛泽东语境人们是很熟悉的。代表性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基本观点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把反修防修的战场转移到国内，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还要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黑暗面，进行一场把全国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校的试验。“五一六通知”说的是文革要破什么，“五七指示”说的是文革要立什么。毛泽东语境在他当政时占统治地位。80年代一度式微，90年代以后中国权力资本化蔓延，官民矛盾加剧，毛泽东语境在互联网上又有复苏之势。其中既有来自民间草根的毛派，也有戚本禹等毛泽东提携过的文革风云人物。

邓小平语境是当下中国的主流语境，代表性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

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支撑了对文革的否定性评价，三十年来成为国内关于文革的言论出版准绳。公开出版的与文革相关的史论著作、传记、年谱、教科书、回忆录，乃至各类文艺作品，几乎都是这一语境下的叙事。这不但是宣传纪律的刚性要求所致，也是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市场利益的导向所致。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批判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小平、陈云主导中国政坛的历史依据，同时也为他们在人事上进一步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做好了舆论准备。文革时期，运动回合多，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的各种恩怨，因而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各级官员包括高级领导人，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努力紧跟毛泽东的部署，这方面的情况被尽量回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宣传要在维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平衡，所以把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

落马高官语境是指一些高官在党内斗争中出局，受到党纪和法律的制裁，晚年撰写回忆录在境外出版。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三位林彪集团成员的回忆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围绕他们披露的史料，海外还出版了多种有关林彪的论著。

这些人都是早年参加红军，文革中进入中共领导层，“九一三”后被关押审查，“两案”审判中判处徒刑，80年代保外就医，刑满后撰写回忆录，去世后在香港出版。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文革的结论是相反的，对林彪集团的结论却一脉相承。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不接受这样的结论。他们强调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尖锐的冲突，林彪反对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把军队搞乱，主张“九大”以后发展经济。他们力图以亲身经历说明，文革中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既不可能被林彪利用，也不可能被江青利用。“利用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还有陈伯达、王力、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



和口述史，也披露了文革的高层内情，填补了史料的空白。研究者不论是否赞成其观点，都无法低估其史料价值。

造反派语境近几年有扩展之势。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年轻的也年逾花甲，更多的到了七八十岁，他们有一种存史的紧迫感。所以在近几年出现很多造反派撰写的回忆录，口述史。还有一些有过造反派经历的人撰写的文革通史或地方文革史即将完成。杨继绳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延续了十年，造反派活跃的时间不过一两年而已。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他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度被他利用的造反者便卸磨杀驴。他不再容忍自下而上的力量横冲直闯，依靠军队，重建秩序。文革的中后期，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1975年的整顿，造反派受到不同名目的审查。毛泽东去世后，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四人帮”，到邓小平主导的整党、清理“三种人”，造反派受到进一步清算。他们到了晚年有很强的表达欲。

造反派写文革的观念并不统一。有的固守于毛泽东语境，至今留恋巴黎公社原则，认为文革的失败在于毛泽东反官僚不彻底；有的则把造反视为争取民主的先声。海外先后出现过杨小凯的“断裂说”，郑义的“两个文革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有的造反派则吸收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理念，从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权利出发，重新审视文革过程，反思自身的命运和遭遇。

评价历史，从国家为本位出发和个人为本位出发，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采用派工作组的方法掌控运动。从国家出发，会解释成维护国家秩序的需要。从公民权利出发，就成了1957年反右派“引蛇出洞”的重演。

造反派语境下的文革史，不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终点。华国锋主政时期的清查运动，邓小平主政后的整党、清理三种人、大学生记录在案，都被视为文革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结局。

以上所举毛泽东、邓小平、落马官员、造反派，都是文革局内人。还有一些文革史研究者属于局外人语境。

最早的局外人语境出自外国汉学家。他们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就开始了文革研究，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也有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的不足。还有一些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出国定居，把文革研究扩展到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

近些年文革研究进入学院派视野。年轻一代学子以文革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者不绝如缕。他们的年龄从70后、80后延伸到90后。他们没有文革的感性体验。接受的学术训练，多是从国外引进的治学方法，注重概念的演绎，从学术概念出发谋篇布局，剪裁和运用搜集到的资料。成果不少，为人瞩目者不多。

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文革研究应当是当代史研究的一部分。不论偏向于哪一种语境，用实证的方法还原文革史的真相，其成果往往为更多的同行所肯定。服从于政治权力的文革叙述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服从于商业利益的文革历史也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只有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究文革，才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

【评论】

##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二）

不平

### 3. 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马屁<sup>1</sup>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批，“左”祸继续泛滥，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7078人，故称“七千人大会”。其规模之大，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当时形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1月27日，刘少奇发表了影响巨大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篇讲话，力图把失控的火车头的方向扭一扭，当然没有成功。这一篇讲话，也影响到了刘少奇本人的命运，这已是人所皆知了。下面是刘少奇讲话：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

<sup>1</sup> 本节所引刘少奇，林彪讲话，均来自张素华所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

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在回答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时，刘少奇一方面坚持“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一方面也说到：“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毛听了这一篇讲话，感觉如何？读者诸君应该不难想象。江青说得很清楚：“憋了一口气”。1月29日，林彪讲话，也就是，影响同刘少奇讲话不相上下的62年马屁。不仅影响到了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影响到了亿万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了林彪本人的地位变化，若干年后的副主席，接班人，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诸位请听：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

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

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个马屁拍得龙心大悦。林彪讲完，毛带头鼓掌，给予充分肯定，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吴法宪作如下回忆：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

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时中央办公厅在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曾有一种意见考虑，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里面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

毛泽东于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谈了两次话。他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

其实，莫要说罗瑞卿，普天下之人，能有几个讲得出来？林彪的徒子徒孙多矣，能及得上祖师爷的又有几人？作为比较，再看看邓小平的表现。邓小平2月6日讲话，从16时38分一直讲到18时。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并且说刘少奇的报告是不容易的；也多次谈到毛泽东的讲话，说是有深远意义的。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更没有讲什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犯错误等于付学费，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等等。邓小平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甚至从头到尾就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吴法宪有如下回忆：

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

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这第二个马屁的特点是“扭”。扭败为胜。无非是颠倒黑白。你要说它不好，我偏要说它好。所需要的，也就是一点：昧了良心，唯毛为上。如果说，刘少奇的讲话让毛憋了一口气，那么，林彪的讲话就是让毛出了一口气。

这就是毛最需要的，唯独林彪可以胜任，无人可以替代的。马屁人人会拍，高低水平不同。这林彪的水平出类拔萃，无人能及。如同李世民所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说，这毛要是选接班人的话，不选林彪选谁？这马屁要拍得人受用，拍得人舒坦，庐山



会议上的马屁，“七千人大会”上的马屁，乃是毛感到最为受用的马屁，乃是马屁中的经典之作。三年之后，犹且念念不忘，回味无穷。1965年冬罗瑞卿到上海晋见毛泽东后，说他准备去苏州看看林彪。毛旧事重提：“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3个小时的报告。”马屁能够拍到这个份上，评为顶级，不为过也。

#### 4. 1966年的“5.18”政变马屁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公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后来被称之为“政变经”：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

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

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

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

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1959年和1962年的马屁，均有所指，这1966年的马屁，乃是属于无对象马屁，或者说，对象乃是全体国民。

这是一个杀气腾腾的马屁。对毛来说，文化革命，要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很多人不支持，很多人不了解，这时候，需要有权威，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需要有马屁。这时

的马屁适逢其时，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对这一马屁进行评析的话。这马屁有两个不足之处。虽然也是马屁，毛也需要，毛也接受，但其舒坦的程度略嫌不足。拍马屁需柔，需温，不可太露锋芒。且杀气太浓，阴气过重，犯了兵家大忌。拍马犹如统兵，杀气不能过重。杀气太重，阴气郁结，天怒地怨，于己不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实和“格杀勿论”一个意思，而比后者更为邪恶。人知“格杀勿论”之恶，故而慎用。林彪亦知其恶而用之，最终一语成谶，应到了自己身上。

自然，有些人会提出异议：你又在瞎说了，难道批彭驳刘也不能杀气太重么？这便是有对象马屁和无对象马屁的区别了。有对象马屁，譬如与人对搏，自当刀刀见血，剑剑穿心。即便是对方已放下武器，但为了护主，为了马屁，连珠炮，迫击炮一起上阵，也顾不得了。无对象马屁恰如大兵过境。如若采用格杀勿论之策，则误杀必多，误杀一多，怨气沉积，于主帅甚为不利。

其二，大家知道，“5.18”的马屁，是一个政变屁。这政变，和文革，关系并不是很紧密。大谈政变，并不能给马屁加分，甚至有可能有副作用。和前面两个马屁比较，这一马屁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毛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其不满之意，溢于言表，马屁拍到这一地步，可见没有拍中要害。■

【大饥荒】

## 一九六零年(五)

——大饥荒对于中国人口和社会的影响

陆 凌

“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

——顾准

大饥荒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人口、政治、经济以及道德水准等，发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由于政治因素，国人至今无法面对，不能正视这段痛史，无法从中汲取教训，这是另外一种悲剧。

### 1. 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

抽象地讨论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和理性地探讨导致饥荒的原因一样，单调乏味，缺乏震撼性感染力，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象牙塔里的学者，不得不板着面孔，业余研究者，只要站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风格可感性一些，枯燥的数字和琐碎的细节可以少一些。

三年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单论非正常死亡人口，也有很多冰冷的数字，仿佛逝去的只是一群蝼蚁，而非千万个曾经鲜活的人。通常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历史事件中人员伤亡的事实才能给后人以震慑，触及灵魂，令人悲伤：

与受害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聆听亲友及他人的口述；

直接地面对与事件相关的史实，如博物馆中陈列的遗骸、遗物、遗迹、遗址、图片、文献、证词等第一手资料；

把此伤亡事件与其它广为人知的悲剧事件联系起来，对于伤亡程度进行直观的对比，提供广阔而悲壮的印象空间。

口述内容有限，暂无博物馆，就做几个对比介绍吧。这里使用的非正常死亡人数-1541万，摘自林蕴晖先生专著，应是同类研究中最保守的一个数字了。<sup>1</sup>

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军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三年大饥荒受害者的人数是南京大屠杀的50余倍，相当于日军进行了50次南京屠城！

1976年唐山大地震-30万唐山市民遇难，三年大饥荒遇难人数是唐山大地震的50余倍；2008年汶川地震死亡人数8万余人，三年大饥荒遇难人数为汶川地震的170多倍！

1931-45年，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因战乱死伤总数为3500万人，<sup>2</sup>平均每年约为250万，而三年大饥荒期间，因饥饿导致的农民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500多万！

三年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创下了中国甚至可能是世界饥荒史之最！<sup>3</sup>清楚直观，三年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是当政者至今不能面对的根本原因。

## 2. “计划生育”就是限制生育

为了缓解饥荒，中共采取的紧急措施一是进口粮食，二是疏散城市人口。随后，长期面对粮食短缺的压力、经济低迷的困扰，中共逐步实行名为“计划生育”实为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大跃进期间，专制的权力曾进入农民的灶房，控制了农民的口腹，七十年代以后，又进入了全民的卧房，控制了中国人的生育。

<sup>1</sup> 林蕴晖，P623。

<sup>2</sup> 于幼军，P236。

<sup>3</sup> 胡平，P540，书中提到英国1993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把中国1959-61年发生的大饥荒列为世界上最大的饥谨。贝克，P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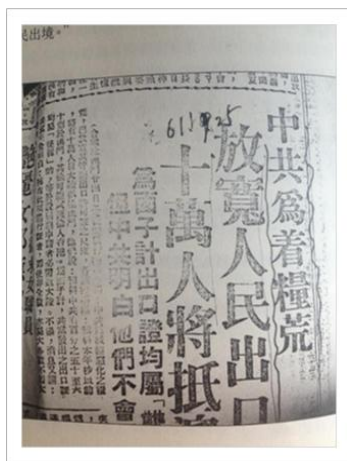


大跃进实行马尔萨斯主义，是一场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sup>1</sup>农村死亡率上升、人口急剧下降，非常血腥，属被动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或限制生育，采取专制的手段，强制妇女节育流产，同样血腥，使出生率大幅下降，是主动控制人口增长。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没有对生命的珍爱和尊重。计划生育，准确地说，就是限制生育，是低能政府头痛医头的应急手段，对于中国的家庭、社会、婚姻、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等，都有日益彰显的负面影响，如今，中国已过早地进入老年社会，专制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呢？

### 3. “吃穿用计划”

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彻底摧毁了毛主导经济的自信。他失去热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经济一线，基本放手让相对务实的经济官僚管理国民经济。



为了度过饥荒，各地官员大胆进行各种尝试。有的离经叛道，如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有的震惊世界，如陶铸等广东官员认为，与其让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1962年5月，中方单方放开边境，约20万难民涌入香港。<sup>2</sup>

大跃进和大饥荒严重扰乱了既定的经济发展计划，1961年初，中共被迫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经济方针，努力稳住（上图：香港报纸对大逃港的报道）<sup>3</sup>阵脚，恢复经济。本应于1963年开始的“三五”计划，因此被推后三年。即使在文革时期，五年计划也从未中断或延后过，这是大饥荒危害巨大的又一例证。

<sup>1</sup> 顾准，P48，P61。

<sup>2</sup> 陈秉安，P200,207,225。

<sup>3</sup> 陈秉安，P232，陈在书中没有注明该报道原始出处。

对于“三五”计划的制订，心有余悸的毛起初的指示是，要考虑3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三五”计划曾被称为“吃穿用计划”。<sup>1</sup>后来，由于中共高层对于国际形势的误判，“三五”计划很快变成备战计划，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此后，当家的经济上不折腾，虽闭关锁国，百姓也能过清贫的小日子。1962年以后，即便是文革年月，农民虽然吃不饱，农村也没有出现大批饿死人的现象，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饥荒。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文革并不是浩劫，大饥荒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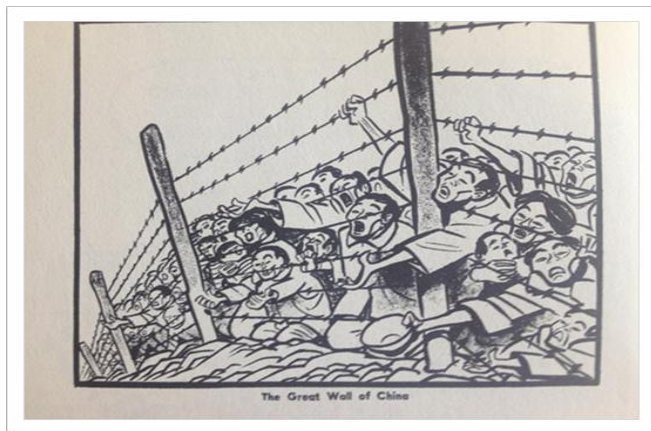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只要当家的不乱来，那怕真的发生自然灾害，认真而坦率地救灾，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1980-1981年中国政府抗洪抗旱赈济灾民的努力引起世界关注，凯恩对1980-1981年的灾害情况和1959-1961年的饥荒情况做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却也不无道理的结论：

在控制天灾的影响方面，计划经济确实比其它经济更具潜力。<sup>2</sup>

必须重申，三年大饥荒，是人祸，不是天灾。饥荒发生后，由于缺乏纠错体制，毛拒

不认错、死不救灾，导致祸延三年，局面一发不可收。这样的事情在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1959-1961年，中国政府不愿救灾，只想否认与掩盖。无论官方或民间，无论中央或地方，没有特别设立赈灾机构，非不能，乃不为也！

从乌托邦的幻境中走出，大饥荒后的中



（上图：难民推倒中港边境铁丝网的漫画<sup>3</sup>）国经济政策基本趋向稳健，对民生有一定倾斜。

“三五”计划的初衷如此，后来比较出名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指导原则也如此，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纠正。大跃进及大饥荒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则要复杂的多。从狂热，

<sup>1</sup> 丛进，P346，343。

<sup>2</sup> 凯恩，P180。

<sup>3</sup> Greene, P76, 需要说明，在该图的注释中，作者写道，此卡通出现的两周前，英美政府均申明（涌入香港的）难民没有营养不良的迹象。五十年后，真相已经大白，陈秉安的《大逃港》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事件。

到低落，到蛰伏，到反扑，到狂暴，或许就是毛从大跃进进到文革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 4. “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1960年，中共没有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整倒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是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正式宣告大跃进结束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于1961年初。尚无法推断，是大饥荒的蔓延影响到中共的高层政治，延迟了中央全会的召开，还是聚精会神忙于中苏之争的中共高层未能及时召开中央全会，耽误了救灾？

通常，一年一度的二届全国人大和三届全国政协会议，1961年没能召开。由国家主席不定期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1960-1961年完全中断。毫无疑问，这都是受大饥荒的影响。“基本原因，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许多情况不透彻，一些话不好说，难于召开。”<sup>1</sup>官样文章都很难做了，说明国务维艰，实际情况异常严峻。

民主的幌子可以抛开，党外的人士可以不见，党内的同志却是无法回避的。大饥荒后，士气低落，人心不稳，死了那么多人，谁来负责啊？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毛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是很形象的。<sup>2</sup>

毛知道大跃进闯下大祸，<sup>3</sup>先是心虚，躲了一阵，口头认错，低头硬撑，风头一过，晃着膀子，走了出来，进而反击。刘少奇在纠正错误中，一再地重申维护毛及其路线，同时也是维护中共中央的威信。刘这样做是必然的，他和毛在一条船上。这在客观上放过了对党内激进思想的深入检查和纠正，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缺陷。<sup>4</sup>毛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令他无法罪己，党内党外又无制裁他的意愿与能力，毛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却毫发未损，继续执掌权柄，没多久又肆意胡来。绝对的权力，掌握地越久，越易犯大错，而错误越大，越要遮掩，越难得到纠正。这就是大饥荒给予中国政治的最沉痛

<sup>1</sup> 丛进，P321。

<sup>2</sup> 薄一波，P715。

<sup>3</sup> 丛进，P356。

<sup>4</sup> 丛进，P357，P351。

的启示。

据刘源回忆，1962年7月某日下午，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刘少奇。刘汇报说，陈云和田家英想正式提出分田的观点。毛大发雷霆，但刘没有退缩，他急迫地说：“饿死了那么多人！”接着他脱口而出，“历史会评判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sup>1</sup>其实，刘并不是党内的右派，大跃进的责任，他有很大一份。刘在文革中的覆亡与其在大饥荒后期、以及“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有关，但关系不大。

从合作化到大跃进，毛豪情满怀，乘风破浪，顺势而为，力图创造人间天堂；从大跃进到文革，毛韬光养晦，出手凶狠，奋力拼搏，力图避免死后被人鞭尸。大饥荒制造的沉重的政治包袱，使中共高层权争走向暴戾，大饥荒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侵蚀了人性，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趋于下滑。

## 5. “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

饥饿与贫穷，营养的匮乏，生存环境恶劣，不仅影响人的发育、健康，还会钝化人的意识，弱化人的意志，使人精神萎靡。整个国家困于饥荒长达三年，幸存下来的人，长期忍饥挨饿，在死亡边缘挣扎徘徊，耳闻目睹大量非正常死亡，承受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道德意识遭遇强力冲撞，道德水平难以维持。

1959年，顾准正值壮年，为了生存，他偷东西吃，日夕奔走于食品点与朋友之门，费尽心机多吃一些。顾是一位学者，有很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内心不断遭受道德的谴责，觉得人变得下流了，反复责问自己，是否变得卑鄙了。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sup>2</sup>面对饥饿，面对生或死，人性荡然无存，道德空洞无物，完全失去约束力，人的行为已无底线。

饥饿是残酷的，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顽强地求生，卑微而低贱地活着。他们不

---

<sup>1</sup> 冯克, P337。

<sup>2</sup> 顾准, P103, 113。

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攫取食物、搜求营养。许多有关大饥荒年月生活状况的写实记叙，令人惊悚恶心：食人，卖身，抛妻，偷盗，捡食垃圾，甚至偷食女人月经，… 人性的沦丧，让人崩溃、绝望。<sup>1</sup>

张贤亮写到，不是我一个人的嘴，不是我一个人的胃，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受到过挫折，而是整个民族的嘴和胃及生活需要，都受到过挫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食物的）剥夺伤害了他的人格，伤害了个体的生活目标、防卫系统及自我实现，从而降低了人的品质，整个民族的品质都因此大大地降低了。中华民族承受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证明心理和意志都是健康的，为何在文革中会疯狂地崇拜、自我厮杀，展现出“空前的民族心理大变态”？这与大饥荒导致的民族普遍的人格、生活目标、心理防卫系统的崩溃，不无关联。<sup>2</sup>

大跃进及大饥荒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计，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几亿农民的命运，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由马列原教旨的激进归于平淡稳健。它是左右现代中国政治进程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准确地说，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三年大饥荒的阴影之中，因为，我们至今不敢，不愿，或不能正视它。

### 结语：资料来源与质量的说明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

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

——乔治·奥威尔

三年大饥荒是个悲伤的话题，几乎每个亲历者、幸存者，说起那段经历，都心潮起伏，或苦不堪言。它又是个敏感的话题，常常让人欲言又止，打开的话匣子又突然合上。

<sup>1</sup> 智量，《饥饿的山村》。

<sup>2</sup> 张贤亮，P300-1。

三年大饥荒在中国是学术禁区，更是政治禁忌。对于文革的反思已不再倡导，但确曾有伤痕文学对其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而对于发生在中国农村这场尸骨累累的大灾祸，却少有名篇佳作予以揭露，究其原因，无外乎政治的钳制和社会精英的冷漠。文革革文，触动的是社会中上层，他们一有机会就哭天抢地，乘便捞取补偿与好处。而大饥荒饿死的是农民，是社会底层，死了就死了。掌握舆论与话语权的人不能说、不愿说、也不敢说什么，他们要的是遗忘。贝克说，饥荒发生时，知识分子要么住在城里，要么被关在监狱劳改营中，对于农民的命运，知之甚少。农民是大饥荒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农民不会写书，不会拍电影。<sup>1</sup>

三年大饥荒，丢开感性的牵挂，擦去政治的色彩，就是饥荒学、人口学 and 经济学等学科的课题，国外的学者就是这么看待、研究这个事件的。对于他们来说，三年大饥荒就如解剖台上一具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他们专业、娴熟地剖开，放到显微镜下认真而仔细地观察，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死者不同寻常的死因，写出一篇有价值的学术报告。他们并不关心死者是谁，心中不会掀起丝毫的波澜。

还需承认人口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就像考古学一样。考古学家通过对一个典型而完整的古墓的挖掘，能够揭示古墓主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甚至还原他（或她）生活场景的细节。人口学家通过对于可靠而系统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就能够揭示某个国家、地区、阶层，在某个时间段的人口总数、结构及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化等情况。这是科学，与政治无关。

有了以上的铺垫，下面详细说明本书资料来源及质量情况，分成三个方面：访谈内容，与若干史志人员及学者的接触，国内外部分相关书籍资料的简评。

访谈的次数及人数都十分有限，基本局限于亲友的范围，访谈所得资料价值有限，不是内容不可靠，而是因为无一例外，访谈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笔者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提起那个艰苦的年月，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独特而深刻的记忆，只是多数不愿细谈。然

---

<sup>1</sup> 贝克，P-xi。

而，他们对于大饥荒的记忆，就像是蕴藏丰富的露天矿，稍做努力，便可大规模采掘。以后的研究者只要及时、认真而系统地在这方面努力，就一定会有实质性的突破。

2012年初，笔者专程去安徽某县地方志办公室索取县志，被婉言拒绝。停留期间，县志办人员表现出的谨慎与防范，令我哭笑不得，感到一丝悲哀。同月，与《中国在梁庄》的作者联系，她明确地说，对于她书中有关大饥荒的记叙，“把它作为史料来引用还有不妥”。同年底，拜访《人物周刊》主编，期望查找有关大饥荒研究资料（特别是图片），无功而返。谨慎而礼貌，拒我于三步之外，是我浅尝辄止的学界探访的基本待遇。

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通常有详细注释，并编写方便查询的索引。即便是因资料来源不清、为学界批评的《饿鬼》一书，仍有注释414条，索引24页，还编写了主要人物简介。相比之下，国内学者这方面的著作，注释少，几乎没有索引，有的写历史就像写小说一样，情节生动，缺乏引证，是非常明显的弱点。

本书共有192条引注，出自51本书刊、2份报纸。为了学术严谨，所引用的内容，注释中只标出笔者查阅的出处，没有列出原作中引注的原始出处（仅三处例外，一是有关环江事件王定文章的来源，二是曹树基的河南非正常死亡数字，三是密特朗对毛接见的叙述）。人口学、饥荒学方面的一些专著，如科尔的《中国人口的快速变化1952-1982》，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等，限于本人的教育背景，有些内容未能通读，本书只是引用或借鉴了其中的一些结论或表格，可能会有理解的偏误。此外，互联网上的文章、传言等，不予引用（“丁戊奇荒”的部分内容摘自网络，未及核对），附录二是直接回应网上对于大饥荒事件真伪的质疑。此外，书中的图片，除已注明出处的，其它均来自网络，未能逐一核实真伪，无法标明原始出处，特此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及简评如下。为了控制篇幅，凡列入清单的书刊资料，除个别以外，在本书正文的引注中，仅列作者姓名（国外作者仅列姓）及引用资料页码，不再重复罗列书刊出处。

- 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卷，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读薄书的目的，是设法以其矛攻其盾，但还是每每为其狡辩与诡辩、满纸谎言、及蛮横而丑恶的嘴脸所激怒，让我有撕书的冲动。但本书引用的薄书第三十章“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中那段文字，非同凡响，字字珠玑。

薄很清楚，历史是无法长期掩饰下去的，大饥荒的真相早晚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因此，他认为写出一部好的‘国史’，是紧迫任务，[薄一波，P2] 期望抓住先机，划定框架，起到有言在先、一言九鼎之效果。对于薄而言，所谓好的国史，无非藉之继续巧言狡辩、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隐瞒真相，而到了真相无法隐瞒的那一天时，能够帮助他们推卸责任、撇清干系。对于有良知的中国人，好的国史，必须摆脱官方宣传的枷锁，进行认真的研究来阐述真实的历史。[李江琳，P1]

2)《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两篇，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 第七版

《墓碑》这部鸿篇巨著是大饥荒研究的标杆之作，立意深刻，资料丰富，论据充分，缺点在于内容庞杂、陈述方式单一，虽有很多有价值的内部文件，但缺乏提炼与升华，同时，对于大饥荒，缺乏第一手可核实的记录。冯克对该书做了尖锐地批评，认为它“只是一个不同来源资料的汇编，而非认真架构的书稿。有时，它看起来像个杂拼，把大段文字拼凑在一起，有的直接搬自网上，有的来自出版材料，有的转录自档案资料。极有价值的文件和无关的传闻混在一起，使读者很难看清问题。”[冯克，P347]

无论褒贬，杨勤奋笔耕，用了十五年时间写出该书，着实不易。他能够挣脱体制的束缚，恪守记者的职业道德，怀幽愤之心，书激昂文字，为其父及数千万受害的农民，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竖起看不见的墓碑，更是难能可贵。

3)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by Jasper Becker,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

这本书2005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了中译本，但本书引用该书的内容，均出自原版英文，由本人翻译。贝克这本书1996年出版，丁抒的《人祸》是1991年。有关三年大饥荒的专



著，这两本较早，影响也较大。

该书的弱点正文中已提数次，这里就说贝克的贡献，他的分析是犀利的，逻辑是清晰的，具有震撼力、穿透力。我常想，一个普通的英国记者，何以对如此沉重而隐晦的中国问题，有如此清晰而准确的把握？而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对此却可以茫然无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4)《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彭尼-凯恩著，毕健康、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2

Famine in China 195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by Kane, P.

该书源自一篇论文，1984年11月提交到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死亡率、社会与生物成因研讨会”上。凯恩三十年前就认为，中国历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使确定1959-1961年饥荒覆盖范围和程度的尝试成为可能。[凯恩，P65]

5)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by Ansley J. Coale,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84

《中国人口的快速变化, 1952-1982》，科尔

科尔在该书中用了接近四成的篇幅介绍数据的来源，详细分析了不同数据来源的相对独立性、1982年人口普查及生育率抽查的主要特点，认为生育率抽查是独立进行的，不是从户口或人口普查资料中转录的。科尔论断来自抽查和普查的生育率及结婚率信息是高质量的，为构建中国人口近期趋势的可靠历史（数据）提供了基础。[科尔，P38]

6)Mao' 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 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by Frank Dikötter, 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毛的大饥荒-中国最严重灾祸的历史, 1958-1962》，冯克著

这本书是近年来有关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香港也出了中译本。本书引用该书的内容，均出自原版英文。冯克严谨认真，所用的资料有些来自原始档案，有比

较独到的分析，结论也是触目惊心的，但他无法打动我，不能感染我。冯克就像一个客观而冷漠的医生，对病人的症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做出了专业的诊断，可他的描述和结论却无法让病人的家属完全认同，是因为他过于理性，还是因为我们过于感性？

冯克采用了十个省级的档案馆资料（除外交部以外，其它中央档案极难看到），较其它同类研究有一定突破。但冯克并不讳言，由于中共对于档案的控制，许多关键信息依然无法接触，这本书所用资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软”。[冯克，P341]

冯克大胆指出在1958-1962年，中国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死于非正常原因，而此前的估计是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二百万之间。[冯克，P xii]他还认为采用“大饥荒”来统称这场灾祸有误导性，让人们感觉1958-1962年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只是不成熟的经济政策的“意外的后果”。饥荒固然饿死很多人，但其中约有250万人是被虐杀的，约占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6-8%。伴随集体化的激进政策，“强制、恐怖及体制化的暴力是大跃进的基础。”[冯克，P xii-xiii]

冯克尖锐地指出，在毛所有的缺陷中，最严重的是他“对于生命损失的冷漠。”[冯克，P xv]1959年3月25日，毛在上海锦江宾馆的会议上提出，要征购粮食总产的三分之一，以保证兑现对国外的承诺。毛说，只要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粮食不够吃，就会饿死人。要想让一半人吃饱，只好让另一半人饿死。[冯克，P88，pp133-134]冯克在书中引用了毛刘周邓等中共领导人很多内部讲话，较为生动。

7)《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林蕴晖著，香港中文大学，2008  
本书是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四卷，金观涛作的总序。冯克对林书比较推崇，所用史料比较翔实，但和国内其他学者的相关著作类似：观点正统，文字呆板。

8)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3,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Vol. 3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Vol. 2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Vol. 1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文革的起源》1、2、3卷，麦克法夸尔

该书是研究文革及大跃进的三卷本经典之作，起初没有通读的兴趣和勇气，先读第二卷《大跃进》，然后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最后才读第三卷《大难临头》。国外学者能对中国的宫廷政治进行如此深刻的研究与解读，令人叹为观止。此书的1-2两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就出了中译本，但鉴于以下两个原因，让我觉得还是阅读英文原版更加可靠一些：（1）中文译者为尊者讳，即便是翻译国外原著，也投鼠忌器，不能或不敢完全忠实原著，有时甚至故意曲解原著的观点；（2）译文有明显的错误，是英文水平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有时还不能准确判断。

9)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LF 1955-1959, by F.C. Teiwes with Warren Sun, 1999 by M. E. Sharpe, Inc.

《中国的灾难之路-毛、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在大跃进发动前后的作用及表现1955-1959》，泰维斯和孙万国著

该书对1955年底到1959年中，中共的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途径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正是这条道路把中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

10)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钱理群，台北联经，2012年1月

钱虽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大饥荒年代，基本都是泛泛的或理论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深度、有价值的观点，写到的1960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白天打灯笼暗喻“暗无天日”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钱理群，P354-355]。但作者对于饥荒年月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其它描述，对于饥荒的严重程度及后果也无任何记叙或统计数字，对于这种高高在上浮光掠影无关痛痒的研究方法，我不能认同。毕竟，钱亲历了那个时代、度过了那段难熬的饥饿岁月，怎么可以没有纪实的回忆？为何不写下目睹或耳闻的饥荒惨况？

11) 《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人民出版社，2009.5

该书有官方正史派头，强调政治正确，不敢太逾距，大量罗列官方文件资料，缺乏深入分析论证，资料来源注释非常少，这是国内现代史研究者的通病。一方面，囿于政治高压，他们只是尽力诠释当权者对于某段历史的官方定论，不能努力搜寻新史料、提出新论点；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专制的环境中，没有自由的思想，何来活泼的文风？文字僵硬，通篇八股，历史事件简单化，政治人物脸谱化。此书初版于1989年，丛长期任教于部队院校，掌握大量内部资料，相关记叙有一定的价值。

12) 《顾准日记》，顾准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读该书的目的是搜寻大饥荒农村饿死人的直接证据。顾在商城日记中，有十几处记录饥荒死亡，约一千余字。许多记叙有具体姓名，可信度高，例如，劳动队八组的黄渤，1959年底，他家一个半月内饿死五口人，具体情况应不难查证核实。

13) 《社会主义在中国 1919-1965》，于幼军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4

于采用章回演义的体裁写党史，手法新颖，力图通俗易懂、增加可读性，但实际上内容老套，观点陈腐，了无新意，新瓶装旧醋，依然是党八股，大段内容仿佛直接摘自党的文件。

14)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Lorenz Lüth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苏分裂-共产世界内部的冷战》

Lüthi 对于中苏分裂的前因后果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对于毛的动机及责任，有独特的解读。

15) 《饥荒与政治》（法）布吕内尔，王吉会译，201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布吕内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把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描述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饥荒。今天，从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年龄断层。[布吕内尔，P6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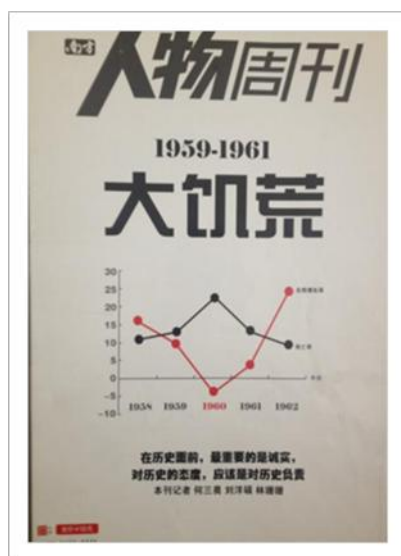
16)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04

《实录》中记载的“粮票作废事件”，对于反映饥谨蔓延专制横行的时代特征，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政府通过发行新票、作废旧票的手段，立马减少兑现4800吨粮食的承诺，

如此做法，多么简单有效、多么流氓无赖。虹影在她的书中提到这一事件，“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指母亲）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 虹影，P206]

17) 《人物周刊》两期，分别为总第 299 期，2012 年 5 月 21 日，和总第 253 期，2011（下图：《人物周刊》总第 299 期封面）年 5 月 16 日



我没有想到《人物周刊》能做出大饥荒专题，这意味着什么？

专题中有四篇文章：一位饥荒亲历者的口述、一名农民作者对于家乡饥荒情况的实录、一个老右派的饥饿与死亡调查、还有一员中共离休高干关于四川饥荒严重程度的汇报，从下到上，四个角度，近察远观，力图证明大饥荒发生过。

两张照片颇有意味：一张是“封面人物”照片，上有两个蹲坐的妇人，中年妇人面容凄苦，老年妇人左手掩面，似在哭泣，照片没有任何标注；另一张也有两个妇人及五六个孩子，他们在捋树叶，标注是“1960年，河北阜平史家寨公社张龙凹大队，农民摘食树叶充饥”。两张照片均出处不明，价值有限。

18) 《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年7月修订本

丁曾亲历饥荒，有浓郁情感和极强的历史责任感，25年前写出此书，实属先驱，足以惊世骇俗。但该书学术及史料价值有限，缺乏确凿证据，数字的简单加减，无法令人信服，虽有若干幸存者的述说，但内容零散模糊。

《人祸》名气不小，丁背景模糊，似掌握了一些内部资料，有鲜明的观点，明确的倾向，但他长于雄辩拙于理论，敢于论断却疏于论证，推论多实证少，演义性强纪实性弱，

香港出版的此类书刊多有类似弱点。

19) 《定远县志》，黄山书社出版发行，1995年2月第1版

地方史志对于发掘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20)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走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著

这本最早于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名著，对于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独裁的论断、对于独裁政治种种暴行的描述，令人慨叹。

21) 《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孙仲旭译，2009.1，英文对照本

这本写于1948年的政治幻想小说，其中的许多情节，很快在中国变成了政治现实。专制政权的邪恶与其发生的必然，是可预见的。小说中大洋国的专制政权，为了永远掌握“纯粹的权力”，不仅控制现实的一切，还努力通过系统地篡改来控制历史。

22) 《平原上的歌谣》，刘庆邦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

这是国内第一部详细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平铺直叙，写的就是一群普通的农民在那个饥荒岁月，如何艰难度日。书中没有什么议论，更没有任何控诉。该书的封套上写到：“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拒绝遗忘的文学是让人尊敬的。”

23)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著，刊载于《麦秸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4

张一弓的这篇小说原载《收获》1980年第1期，以后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内地几乎绝迹。2009年《平原上的歌谣》的出版是一个富有含意的新动向。

24) 《饥饿的女儿》，虹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虹影出生在1962年，对于大饥荒并无切身的经历。虽然她写到，“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一个个消失”[虹影，P166]，他们的死亡，都与饥饿相关，但毕竟她本人没有看到这些亲人被饿死，不是悲惨遭遇的见证人。

25) 《我的菩提树》，张贤亮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1

这是一本日记，可作者偏说是小说。书中主人公就叫张贤亮，但不清楚书中其他人物是否用的是真名实姓。作者一方面用极其辛辣、嬉笑怒骂的笔触对毛进行控诉，另一方面又对邓小平进行毫无廉耻、不加掩饰的吹捧。张说自己死了，可那时他分明还活着。

卑怯地呼喊“千万不能再走那条路”[张贤亮, P308]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交待清楚，那是一条怎样的路？它充满饥饿与死亡、奴役与专制、愚昧与野蛮、欺骗与背叛、悬崖与陷阱。我们必须说明白，我们是如何步履艰难，付出巨大代价后，才侥幸走出来的。

26)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

阎是农家子弟，对于三年大饥荒不可能一无所知。阎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村里老人们的述说，后悔没有在还来得及，去询问他们在那特殊的三年岁月里是如何苦熬度日的。我想问阎，你真的一次也没有问过父辈、没有问过同村其他长辈、没有问过村里饿死的人的后人：1960年前后，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相信阎有能力、有条件、有一份历史责任，去写中国“农民为了生命和亲情、和所谓的‘自然灾害’用活着的信念，去抗争饥饿与死亡的一部生命的史诗。”[阎连科, P84]

27) 《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著，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此书论点陈腐，文字俗套，史料缺乏考证，不够严谨，甚至有明显错漏。但可以让读者近距离观察长沙及宁乡部分地区大饥荒时期实际情况，略有意义。刘在湖南考察期间的最大功绩就是解散长沙天华的公共食堂，但可以确定，解散食堂事先得到毛的批准，而非刘的首创或勇敢之举。

28) 《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从《三联生活周刊》上了解到这本书，该书的国内版就是三联出的。我本能地感到国内版一定有删节，所以还是阅读香港中大的版本，它的封面以灰黑色为主基调，在封面的右下角，赫然地贴着一个直径四公分的圆形红色标贴，上面写着“忠实原著-未经删节”。

《三联生活周刊》选登了该书国内版的导言及部分章节。我作了简略地对比阅读，果然，仅导言部分，国内版就至少有五处删节。中共处心积虑地控制言论和思想的做法固然令人

厌恶，但也让人们清楚地判断出他们的软肋所在：就是毛泽东、大跃进和大饥荒，当然，还有六四。

1989年7月2日，六四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邓在北京接见美国总统特使、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伏特，会谈中，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傅高义，P570]如果说，在漫长的22年中，牺牲了2000万革命先烈，给了中共坐江山的理由和资格，那么，在中共统治之下，在短短的3年里，却至少饿死了1500万无辜的农民，难道这还不足以剥夺中共执政的权利及合法性吗？

本书引用、参考的其它书刊，罗列如下，不再一一评述：

29)《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林蕴晖、丛进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8

30)《大跃进-苦日子 上书集》，余习广主编

31)《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著

32)《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张纯如著，萧富元译，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2月第二版

33)《夹边沟记事》，杨显惠著，花城出版社

3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著，台北：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9.8

35)《走向混沌》，丛维熙著，花城出版社，2007.1

36)《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沙青著，刊载于《十月》1988年第5期

37)《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李江琳著，台湾：财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7

38)《“大跃进”亲历记》，王梦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39)《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

40)《饥饿的山村》，智量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 41) 《出使苏联八年》，刘晓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3月北京第2版
- 42) 《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春桃，华文出版社，2009.9
- 43) 《“天灾乎，人祸乎”：1928-1930年西北大饥荒》，edited by Andrea Janku, 袁剑译，刊载于《中国学术》第3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44) 《大逃港》，陈秉安著，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1
- 45) 《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胡平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04
- 46) 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by Felix Green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Y., 1964
- 47) 《文化十日谈》，丁东、谢泳，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0 第一版
- 48) 《毛泽东的人肉政权》，杜斌编，明镜出版社，2013.2
- 49) 《毛泽东传》，by Philip Short, 仝小秋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 50)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叶永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 51) 《南方周末》，2012-02-16，第24版，《一份苏联时期珍贵的历史档案》，作者杨联芬
- 52) 纽约《世界日报》，2012年4月28日B1版■

【述 往】

## 陈乐生“枪杀红卫兵”事件

陈仁德

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从忠县川剧团紧闭的后门里伸出一支手枪，随着一声枪响，两个少女倏然倒下，一时剧团内外大乱。很快就查明了，开枪打人的是忠县文攻武卫司令部陈乐生，他当即被抓起来。此事被称为“枪杀红卫兵”，迅速轰动忠县。

当时，川剧团是县城的娱乐中心，但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晚会，都是在川剧团剧场举行。（剧场是一座破旧的城隍庙改建的，毁掉庙里的阎王判官黑白无常等塑像，稍稍改造一下就成了剧场。所以老忠县人还是习惯叫这里城隍庙而不叫川剧团。）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晚会是不售票的，只要挤得进去就可以观看。为了晚会顺利进行，一般在满员后就会关闭前后大门。这时往往还有许多人拥挤在门外，总想找机会挤进去。1967年8月进入武斗高潮，保守派被全面打压下去，全县是造反派的天下。虽然忠县没有发生大的武斗，但是文攻武卫司令部还是建立起来了。每逢剧团有晚会，司令部就会派员执勤。威风凛凛全副武装的执勤人员游走在剧场内外，人们便不敢随便拥挤。

那几天正逢开江县“6711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忠县演出。这支来自大巴山的宣传队在忠县连续演出三天，场场爆满。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舞蹈《远飞的大雁》，几位少女柔美的舞姿一反当时舞台上横行一时的强硬喧嚣之风，配以优美的旋律，使人耳目一新。每天都有大量的忠县人潮水般涌向剧场。那天是演出最后一场，大门关闭后，还有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不愿散去，一些人转移到后门，拍着门板要进场。正在执勤的陈乐生，腰上插着一把手枪，怒气冲冲地隔着后门向外面大声吼叫，不准再拍门。陈乐生年近五十，头发斑白，面容黑瘦。他是一个有来头的人，早在1949年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有一些可供吹嘘的“革命历史”，现在是县林业局干部。陈乐生见仍然有人从门缝往里望，不禁霍地一下拔

出手枪。正好门板下方有一个木疙瘩形成的空洞可以伸出枪口。陈乐生于是把手枪伸出去砰的就是一枪。

隔着门板，陈乐生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听见枪一响，外面便传来一阵惨叫声，听声音还是女孩子的声音。原来正好有两个女孩站在门外，那一枪射出去，一下击穿了三只腿，两个女孩同时中弹。

两个女孩都还是高小生，顶多十三四岁，一个叫苏萍，一个姓吴。姓吴的名字不详，只知道她哥哥是我姐姐初中同学吴兴万。苏萍受伤较重，被击穿两只大腿。那时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红卫兵，于是，陈乐生“枪杀红卫兵”遂成铁案。其实俩女孩当时都只是红小兵，要中学生才是红卫兵。但是，不由分说便成了枪杀红卫兵。当晚两个女孩送到医院救治，经检查枪弹击穿大腿幸未伤骨，并无大碍。

当时的忠县红卫兵造反组织叫“红卫兵忠县部队”，正与文攻武卫司令部有些闹别扭。因为文攻武卫司令部不同意给红卫兵发枪，而狂热的红卫兵小青年们非常渴望玩枪，正在与司令部一再交涉，“枪杀红卫兵”正好成为向文攻武卫司令部施压的筹码。文攻武卫司令部见事不妙，立马就把陈乐生抛了出来。

当晚的演出现场一时大乱。陈乐生当即被文攻武卫司令部关进司令部所在的县人委大院（后为公安局驻地）。

第二天早上，闻讯赶来的红卫兵冲进大院将陈乐生揪出来斗争。那时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了，我每天都闲着无事，喜欢看热闹，也跑到大院去了，便目睹了血淋淋的一幕。

只见愤怒的人群将陈乐生团团围住，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陈乐生完全没有了昨日的威风，低着头一阵哆嗦。一个叫“孙毛笔”的青年唰的一下解下腰间的铜头大皮带，凌空向陈乐生砸下，亮闪闪的铜头打在陈乐生头上发出当当的声音，鲜红的血立即冒出来，瞬间染红了斑白的头发。“孙毛笔”一边大骂，一边继续挥动皮带，令人心悸的当当声再次响起。陈乐生掏出一张手巾去头上擦血，手巾立即被染红。这时旁边一个人大叫一声：“他狗日的还想保存证据！”劈手就把浸满鲜血的手巾夺过来扔到地上。血流满面的陈乐生惊恐

万状，像任人宰割的猪狗。

我当时站在“孙毛笔”背后，离陈乐生仅一米多远，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随后，陈乐生被押到忠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大本营关起来。又过了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学校（忠县城关民中），路过师范学校时，看见陈乐生在操场下面的一间屋里，满头都包着白色的绷带，靠窗的桌边写交代。我们的位置高过他的窗口，正好居高临下观察。有个同学猛喝一声：“陈乐生！”他惊恐地停下笔，向我们望了望，又低下头去写交代。

我回到家里讲了陈乐生的事情，父亲淡淡地说：“陈乐生……我熟悉。地下党，凶得很。刚解放的时候他在官坝区工作，身上随时挂着枪。有一天一个地主的女儿出嫁，他把花轿拦下拉出新娘子，当头就是一枪。新娘子当即毙命……那时地主的女儿死了就死了……”父亲的话让我极为震惊。陈乐生竟然可以随意拦轿枪击新娘子，无怪乎可以“枪杀红卫兵”。

文革波澜起伏，过了一段时间街头巷尾又是另外的奇闻，陈乐生就没有人提起了。直到次年，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发表后，陈乐生又被摊上了祸事。在“三·一五指示”中江青明白无误地说：“川东地下党都是叛徒。”这下陈乐生曾经引以自豪的地下党身份就成了叛徒的代名词，没有好果子吃了。有一天我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看见林业局的几个年轻人揪着陈乐生游斗。陈乐生手中举的纸牌上居然是一首散曲“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原来陈乐生在苦闷中，把马致远的散曲写出来消遣，不小心被发现了，便拉出游斗。一位林业局姓刘的年轻人（姑隐其名）振振有词地批判：“断肠人是谁，就是刘少奇。他是在为刘少奇招魂！”

再后来我就到农村插队了，陈乐生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孙毛笔”的结局我知道。我在农村时他窜到我队上来过，我还留他住了一宿。“孙毛笔”大名好像叫孙宗玉，因为祖上以制毛笔为业，人称“孙毛笔”。文革后期他被判刑，送到奉节硫磺厂劳改。有人传说他越狱被击毙了，又有人说他刑满留场就业成家了。到底如何，已经没有人再关心。■

2016年3月16日 重庆

【述 往】

##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二）

王复强

### 逃跑回家

中国版图最北端，隆冬子夜，北风肆虐。今夜轮到我烧火值班，决定逃跑回家。

我们宿舍住70多个知青，第一年冬天砌了个“火龙”（通俗的叫法是火墙）在通道中，维持夜里室温，每晚派人添火。第二年就不搞了，要省柴火，从那之后，冬季早晨宿舍室内温度为摄氏零下26度，我们每晚都是带着狗皮帽子睡觉，早起被头是一两寸长的白霜。

几百个京沪知青都想回家探亲，农场一律不准。我决定趁值班之机不辞而别。你不准假，咱就溜。子夜一片鼾声，我添足柴，提起行李出发。黑森森的西伯利亚荒草甸上寒风割面，沿分场小路走十几里就能上黑嫩公路，再往南走100里就是嫩江县火车站，从那坐火车站往南约一千多里到齐齐哈尔，之后就可坐火车回北京了。

黑暗中走了十几里，身上的棉衣棉裤、军大衣、狗皮帽、旅行包变的愈发沉重。全身大汗但不敢摘帽脱衣，我知道零下40度瞬间就会冻伤，有次我摘下手套才十几秒，两手就冻出大水泡。夜空漆黑，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前行。狼嚎此起彼伏像女人的哭声，精神亢奋的我并不在乎，群狼天天晚上在宿舍外嚎哭，早已习以为常。终于上了黑嫩公路，往北是苏联边境，往南是县城，我已累了，默默鼓励自己。风声传来汽车马达的呜呜声，两道车灯光柱在黑夜荒原上分外耀眼。我站在公路中间，挥舞双手招呼司机停车，盼望有幸搭上顺风车。

距我几米处，车停了，我用手遮着晃眼的车灯兴奋地向车奔去，就像飞蛾扑火。啪 啪！两声尖厉枪声划破漆黑寒冷的夜空，刺目灯光中几个黑影跳下车奔向我，还没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我就被按倒在地，五花大绑抛上车槽。车子掉头向回开去！缓过神来，听到基干

民兵排长李大牙边踢边喊：让你小子跑！忒胆大了，回去算账！明白了，我是自投罗网去拦截追捕我的车，太傻B了！

押解回去被关进个小班房里，门口持枪民兵昼夜看守，天天不干活，天天写检查，天天提审挨训，天天有人送大饺子饭给我，估计这是劳改农场原有的关人的小号。提审老问谁是同伙？我哪来的同伙，不是一个人跑的吗？来北大荒这么久就这十来天过得爽，不干活不开会，睡得香，有饭吃。临了蒋场长亲自与我谈话，他原是管这的劳改犯的老警官，告我调查结论：属个人独立犯错，明天开批斗大会，需做深刻检讨。他语调平静，问我出身，答爱国知识份子。有啥历史问题(档案上都有，瞒不了)，答：爸是右派，爷爷在秦城。秦城是哪？答：北京郊区一个大监狱。噢，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自己选择。答：对对，因此我才响应号召来保卫边疆，插队锻炼。蔡场长身穿羊皮大衣，狗皮帽子，满脸皱纹，临了告我：小伙子明儿好好检讨，教育大家，做个反面教员。

大会开的很成功，大食堂中黑压压几百个知青听了私自逃跑的反动事例及触及灵魂的检讨后，深受教育。大会之后北京和上海知青形成一股请假不批就逃跑的全场浪潮，我本人在大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周，也终于逃跑成动。失败是成功之母，当地老乡告我那晚要没被抓回来，必死无疑，狼群肯定将我撕吧了餐掉。而且晚上一个人跑太显眼。吃一堑长一智，因此我这次改成是大白天走，不显山不露水，顺顺当当走出农场到了县城。负重走一百三十多华里是我人生第一次，穿着棉大衣、棉裤、大头靴，提着偷的一旅行包的东北黄豆，走的两大腿内侧淋巴腺全肿了，满脚大泡。夕阳下远远看到嫩江县城后那最后的十里地，我是一寸一寸挪过去的，蹭了足足几小时，天全黑了我才到达了嫩江县火车站。

此行出发时三人同行，马有为是上海知青，“大牲口”是鸡西知青，三个人结伴早上七点出发，老马走到约四十多里就不行了，坐地上死活不走了。“大牲口”看着最壮，走到七十里时就躺路上哭了，喊着妈呀累死了，我走不了了。我一声不吭继续走，向着回家的路，一个人独自走在荒凉而白雪纷扬的路上。半路我掏出从小卖部买的炒面，抓着雪，塞下喉咙，那油炒面粉没水是咽不下食管的。约晚上九点我才终于到火车站，老马比我早到了，

他告我，很幸运半路拦着顺风车，在大卡车后车斗坐了几十里到了嫩江。我们一块从嫩江坐小火车到齐齐哈尔，换车后他去大连，坐船回上海。

我没钱买票，就扒火车南下回北京，到山海关我下车溜出站台，知青都知道一进山海关就查票，不买票扒车的知青及农民都送去砸石头粒，啥时把赔款挣出来啥时放。出了车站我在山海关玩了半天，从鞋中摸出藏得发臭的几元钱，不情愿地买了张山海关到天津的火车票。过山海关后车上果然检票，我出示火车票过关，一大帮老乡在车进津京之前被抓下去了。火车过丰台后我在一个小站下车，叫望京站，再往前就是终点北京站，那儿太严溜不出去。顺站台直走溜出去就大功告成了。“嘿，站住，那孩子听见没！”一位着深兰铁路服的大叔叫住我，问，“有票吗？”“没有。”“那来的？”“东北。”“知青？”“嗯。”我想反正没钱，爱咋地就咋地。“唉！走吧，前边一拐有市郊车。”我说了声谢，拔腿就走。碰上好人了。再说，谁家里没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啊！

两月后回到北大荒，上海知青告我，马有为到大连就走不了了，两脚全冻黑了，坐船回上海是抬下去的，他妈在码头，接着抬下来的儿子已是个残疾人，她妈哭了，直接去医院十脚趾冻死截肢。马有为搭顺风车，脚上有汗坐车后斗，一个小时双脚冻残，到嫩江时尚不严重，从齐齐哈尔与我分手后就走不了了，他十个脚趾全截肢了，后来再见他是一年后，他走路像小脚老太太，用后脚跟着地。

## 离开北大荒

“这辈子不能在这活。”

我一直这么想，到北大荒第一天起我就从没被“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扎根边疆一辈子！”这类口号忽悠过。一晃到北大荒两年半多了，这三四百个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没有人能离开这，除了两个当兵走的，一个是北京女知青，听说老爹是兵团级正职，还有一个是武装基干民兵连连长鸡西知青张马屁，这小子临走哼着小曲收拾行李那得意劲，刺激得我

几天缓不过劲来。

土默特旗插队同学来信讲他已从村里被抽到县城当建筑工人了，我有点心动，灰暗严冬中似乎出现了一丝遥不可及却又若隐若现的希望。但思前想后又觉着没啥可能性，首先是几乎没可能脱离这个半军事式化管理的山河农场，再有我也没法一个人找地方去插队，最后就算我插队了，也很难被招进城当工人。知道这纯属瞎想，但这念头却又挥之不去。当时还有个得病知青可退回城市的政策，爸爸朋友粟叔叔的儿子毛头从河北插队病退回京了，我也想试试。

1972年春节回京，我就跑医院看肝炎，我1968年得过甲型肝炎，69年插队时并未全愈。这次冬天回京后，我有意开了一堆病假条、诊断证明之类的东西，并每月一批往农场寄，告诉领导要续病假，其实是给申请病退造舆论。在京3个月到处跑病退手续，街道、区知青办等都一口回绝，才知回京病退这条路毫无可能。这期间碰到了朋友的哥哥，他在内蒙巴盟杭锦后旗当文书，讲那儿可帮助开证明接受插队知青。又碰到爸爸清华同学徐家骏的儿子徐伯平，他在齐齐哈尔郊区劳教释放后留在当地当农民，当年是因聚众闹事判了劳动教养给发配黑龙江的。他同意帮我去农场办因病辞职手续。

当时这种荒诞离奇的思路，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有点扯蛋，本来想办因病退回北京，现在却改成因病转内蒙插队，而内蒙插队比北大荒农场更艰苦。这时爸爸开始反对我，但他安排让徐伯平帮我去农场的事却已启动，数月来的分批寄出的请病假及诊断证明，已造成农场我是个病号包袱的印象，一切似乎都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非要离开北大荒，宁可去内蒙插队，我认为在农场就得呆一辈子，去插队还有可能被招进城。爸爸曾对我说过：辞了农场千万别办不成落户，那你变成了没着落的“黑人”了。徐伯平4月去嫩江山河农场，办成了我退离农场的手续，寄给我一纸农场的退场离职证明。

1972年5月我买了两条香山烟、三瓶二锅头登车去内蒙。我已20岁了，自己的命自己定，豁出去了！先在呼和浩特五舅家落脚，五舅是最关心我的长辈，是与妈妈感情最深的五哥，他毕业于美国教会在沈阳办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当医生，赴哈佛深造，任中



国医大儿科主任，1957年身为民盟成员的他被打为右派发配内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他白天拿一把帚把、一个水桶，上班去打扫厕所，晚上回家在土炕上看大部头英文原著医书，他是中国当时儿科医学权威之一。病人们可不管政治，给自己孩子医好病最要紧，他们仍想办法找被罢职的五舅给孩子看病，仍尊敬地叫他项教授。我去巴盟前路过呼市住五舅小土房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他感恩不尽的患者家长小王，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户籍警察。他的孩子得重病，看遍了各大医院也治不好，后辗转打听有位项教授是反动学术权威，已罢职挨斗扫厕所，小王找到五舅给他的孩子看病，五舅手到病除。从此小王与五舅成了朋友。小王明确告诉我呼和浩特与北京不同，知青只要有插队所在地的公社病退证明，他本人就有权给其在呼和浩特市上城市户口。当时对此我没太在意，因为对我来讲，首先得先成为一个插队知青才行，之后才谈得上用插队知青身份申请病退。

背上书包，我从呼市乘火车经过包头去巴盟杭锦后旗昭庙公社，同意接收我去插队的证明是那给开那儿的，在临河县找到了帮我开证明的旗政府当办事员的朋友。但事情出现了大的变故，朋友明确告诉我：你不能真的来，只能私下开张证明帮你回农场办辞职用。来插队的知青，都是政府有组织安排插队。我当时就昏了，即我辞离了农场，又进不了农村，成了“黑人”，没单位，没身份，没城市户口，也没农村在籍。我茫然认识到，在户籍制无比严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面上，我竟无下脚立足之地了。我咬了咬牙并无底气地喃喃：不收我，也得去公社试试！

坐上从临河去杭锦后旗的破旧汽车，心情沉重地一路摇晃到旗里，打听从旗里去昭庙公社还有20多里，问了方向后独自踏上黄土飞扬的土路。大中午的路上几乎没人，每次远远看见个老乡就喊着问路，对方无论步行或骑车，一定会过来满脸认真地仔细指点。记得几只喜鹊半路上围着我又叫又跳，而旁边即无树木也无庄稼，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里泛白的盐碱地，至今仍有点纳闷，哪来的喜鹊，当时想是不是预示着可能有好运？

约两个小时找到昭庙公社社部所在地，是个三进院寺庙。也许公社干部们午休还没上班。走累了，我就在破庙的正殿台阶上坐下等着，忐忑不安地张望着这空荡寂寞的院落。

一会从庙门口进来个年青人，斯斯文文带个眼镜，不太像当地干部。问我：知青吧？什么事。我麻利起身恭敬答到：对对，是知青，嗯，还不是知青，正在想办……。我讷讷地纠结着讲不清楚，斜眼瞟他一眼，后悔上来这句就得让人家起疑。他脸色平静地问：北京的吧？字正腔圆的京片子，让揪紧的心似乎松了口气，边陲古庙闻乡音呀！我他妈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边掏钥匙开门边讲：进来说吧。我蹑着脚跟了进去，也许是他的京腔，也许是这凉爽的空气，进来后我就稳住神了。我掏出了那封不知是谁盖了个章的接收插队证明书递给他，并声明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办到昭庙公社落户插队手续的。他仔细看着这封信，沉默着，那一刻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漫长的数秒后他缓缓讲：不行！我们这儿不接受单个自己来插队的，落不了户。他回答的斩钉截铁，也没问我这封信是怎么来的，也许那根本不重要，反正是办不了。虽是在意料之中，真听到后却仍感是晴天霹雳。在无奈中我溜出句：噢！您是北京的吧？他答：是呀，人大毕业分这儿锻炼的。随后我将自己的困境向他简略说了一遍，我知道他没权办我插队落户这事，但那时却需找个人诉说我的绝望，何况对方是北京老乡。又是沉默，片刻后他说：确实没法给你安排落户，知青口粮是有指标的。他边解释边讲：如你能办医院证明，我可以给你开个病退函，你拿回京去碰碰运气。我猛地想起呼市警察小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有肝炎诊断证明，我带来了。说着就往挎包中翻，这本来是我准备先插队落户后，再寻找机会派用场而准备的，也许根本没用，因为如想被招工进城必须身体健康才行。他抬起一只手对我摇摇，另一只手拉开抽屉拿出几张有红色横线的信纸，讲：甬掏了，我不看，你自己在这纸上写病退证明吧，我给你盖章。隔着张破旧办公桌飘过来这么平平淡淡的一句，像古刹钟声震我脑袋仁嗡嗡地发昏。深吸了口气告戒自己沉住气，将信纸从他面前转过来移到眼前，公公正正地写下病退证明信抬头，并写到知青王复强是爱国华侨王福时之子，劳动表现良好，思想觉悟高，现经医院诊断患有甲型肝炎，不适合农村体力劳动，我公社同意该同学退回城市治疗休养，请予协助办理病退回城手续。此致，革命的敬礼！巴颜高勒盟杭锦后旗昭庙公社革委会。以上内容我至今记的很清楚，写完后递过去闭住气看着他。随即他拿出公社大印清清楚楚盖在右下

角，又找了个信封仔细将信叠好放入，递给我，命运在这几分钟内拐了个大弯。

我起身感谢告辞。在那个偏远荒僻的破庙中与他的偶遇，只几句话，只十几分钟，甚至没问过他叫什么，生命长河中那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却影响一生。我匆匆转身出门想在天黑前赶回临河，又站住转回身，从挎包里掏出带来的香山烟与二锅头放在桌上说：北京带来的，留你这儿吧。他爽快收下，没有寒暄，没有客气，平淡而真实。

回去路上我才慢慢回过味来，越想越兴奋，我谋划数月的内蒙插队落户生涯，万万没想到竟短暂到尚未开始就结束了！

赶回到临河已天黑了，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一问，一晚上一元钱，有点承受不起，再说根本就睡不着，白浪费。招待所外墙有个封闭不用的门洞，上有门檐、下面是水泥地，我就在那儿过了半夜。凌晨四点，去临河火车站，那停着几列东来西去的列车，我估计拉煤车都是从西边乌海往东开的，就趁天没亮爬了上去，躺在煤上以防被发现。天蒙蒙亮，车果然向东开了，列车飞奔，煤碴被风吹起打在脸上生痛，但心情极好，全不在乎。回到呼市，先是五舅、五舅母替我高兴，五舅忙请来警察小王，小王仔细看了我带回的公社介绍信，半晌抬起头讲：能办！之后直接带我去派出所办了呼和浩特市户口，一切简单顺利得不可思议。北京—北大荒—巴盟昭庙公社—呼市，一次生命的轮回，灵魂的磨砺。

## 内蒙当工人

1969年离京插队，1972年落户呼和浩特，三年下乡生涯结束，我们三分场那几百知青中也许我是最早回城的。从那之后我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在天苍苍，野茫茫中生活了三年后，我对教室的渴望，对知识的饥饿，都从遥远模糊中变的触手可及了，我决定暂停对文史哲的学习，恶补数理化。几个月后五舅托另一个病人的家长，内蒙古自治区重工业厅厅长程风涛，把我介绍到内蒙古工业学校实习工厂当工人，但由于没落实招工指标，我们这批学徒工前两年没发工资。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每日的工作与学习，我每天工作之余，用一

年多时间将初一到高三的数学、物理、化学自学完毕，我的全能老师是郝老师，他是教机械制造专业的老师，从大连毕业分配到这儿，我看不懂的就去问他，他几乎是数理化无所不会、无所不答。我俩 1973 年一块报了内蒙古大学的英语夜校，那个陈老师特好，课堂上老爱冒出几句政治牢骚，却又都是话说半句你自明，特爱上他的课。这个班开始时大阶梯教室坐满近两百人，一年半毕业考试时只有不到十个人坚持下来，记得开卷考试卷子是用油印的有几十页厚，我与郝老师各自完卷。而后我自己又报了市工会办的机械制造专业工人业余大学，最棒的是内蒙古大学的陈教授教的高等数学，和内蒙古工学院留苏回国的徐国斌老师教的材料力学与理论力学。听他们讲课就是享受，其语言之美，逻辑之强，治学之严，我后来真上大学后也极难遇到。印象深的是徐国斌上课永远不带一张纸，备的课全在脑袋里，每次上课两小时滔滔不绝而又滴水不漏，治学极严谨，一只粉笔一个公式从大黑板左上角层层剥皮、丝丝相扣，推演到右下角，得数可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听他们的数学课、物理课真真正正是享受。这两门课也是开班时工人俱乐部小礼堂坐满 100 多人，一年半多毕业时每班都不到 10 个人。那 4 年我每周三四个晚上九点半下课回宿舍后，每晚无论有课没课做功课都到午夜十二点，很知足很解渴。

在呼市有了冬天滑冰，夏天游泳的条件，夏天每天中午收工马上吃饭就去体育场游泳池，游 2000 米上班。我跟郝老师组织了工厂排球队，天天苦练，满世界约比赛。冬天工业学校的冰场就离我住的宿舍几十米远，每天晚上十二点前扫冰泼水，正好我每晚十二点半做完功课冰场也新泼完，我就天天到刚泼完镜面似的冰面上，夜色之中一个人溜冰压弯道，爽极了。内蒙当工人那几年劳动、学习、体育忙碌得很，过得充实而愉快。

我们这批 20 几个工人是自治区工业厅厅长及机械局田局长安排的，后来发现受到市劳动局的抵制，不能落实劳动人事指标，因此两年多都没领到工资。1974 年我们这伙学徒工决定去劳动局及市政府要求落实招工指标。我们先是轮流去劳动局静坐，去市府贴大字报，闹腾了两周没用，又去劳动局王局长家去静坐还不行。其间冲了两次市政府常务会，无奈之下我们 20 几个男女徒工一天上午从呼市市府大楼将市办公厅主任张灿公（原乌兰夫

秘书，后任自治区副主席)拧着从市政府走到火车站，硬拉他上了火车，去北京上访。火车开到卓资山站被叫停了，自治区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知火车停运，政府派代表来与我们谈判，这帮男女小徒工年龄都是20岁出头，相比之下我历练多点，我自然成了这帮人的头头，首先是定了不答应条件坚持不下车，安排几个男徒工看着张灿公不能跑了，并严令不准动粗不许伤着他，外边全是女生围着做第一道防线，万一上来警察，女生先阻拦。我与自治区代表谈了长达十多个小时，这个客列车停运了16个小时。我们条件很简单，要求呼市政府落实我们这20几位徒工的招工指标，并补发每人2年每月16元工资，即每个徒工要补发两年共欠的300多元工资，不答应就坚决带着张灿公去北京上访。我们这边谈判，那边自治区政府也开会研究，他们之间还能打电话商量，我们这边就靠自己琢磨应对。僵局持续到半夜，谈判是隔着车窗我在车上，政府代表站在月台上，中间有时政府代表会去车站办公室与自治区领导商量。最后政府代表表示经领导研究同意，如我们马上回去，政府一定言而有信，落实我们的要求。同时警告我们，列车停运十几个小时是严重的事件，带着市领导去北京上访也是从未有过的胆大妄为行动，政府是绝对不能让我们走的。政府代表要我们带张灿公下火车到招待所继续会谈，不然后果自负。我当时心理压力极大，首先是京包线客运已停运16个小时，旅客都急了，开始乘客们不知道为啥列车停了，后来传开了是我们闹的，就有好多人围观，发牢骚。另外看意思政府绝不会让我们这帮人带着市办公厅主任去北京，给他们丢脸，再有政府也有了某种程度的承诺，徒工内部已有人劝见好就收，审时度势，大约午夜1点我同意妥协。下车后被安排住进车站招待所。其间呼市办公厅张灿公仍由我们控制，与我们住一块，但那已是形同虚设。早上政府派来辆大巴，拉我们回到呼市。回去后政府并未整我们，两个月后补发了工资，我们这帮徒工都转正了，那已是1975年初。我们取得了一次青年工人维权活动的胜利。

1976年我去广州上大学，离开了生活4年多的内蒙。■

2015年10月25日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五）

——苏北农场（下）

王丕忠

### 逃跑计划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场部召开奖惩大会。劳改犯因此抱着获得减刑的希望，认为以前闹过一阵的五一减刑的政策诺言，可能在这次大会上兑现。哪知大会上宣布减刑的人数只有十来个人，不到总人数百分之一，而且大多数只减一年或半年，相反加刑的人数却大大超过此数，所加的刑期也较长。这次大会完全是象征性的政策兑现，而且是好事不兑现，坏事必兑现。

无怪在这次大会以后，劳改犯逃跑的事，陆续发生。当局对劳改犯逃跑当时不宣布，只是在抓到后才公布。那时分场外围有两道警戒线，但由于面积广阔，警戒线很长，岗哨人数不多，看守不过来，劳改犯要逃越警戒线并不困难。问题是即使逃了出去，在社会上也无法生存。

解放后不论城市或农村，在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下成立了严密的居民组织，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万难立足。即使潜伏也必在众目监视之下被识破逮捕，再加逃犯没有粮票和钱，更是寸步难行，随时随地都可出问题。据说也有少数逃犯因为是窃盗，有偷窃的技巧，能借此为生，在各地流窜，久久未被逮捕。从分场逃出去的劳改犯，大多数是在社会上逮捕后就地处理的，当然是性命难保。

据场部公布，有两次是本场武装人员逮捕的，其中之一是该逃犯在偷越警线时当场被打死的。据说他被发现后，拼命地跑，武装人员用自动步枪接连射击，他身中多发子弹均

未中要害，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另一案是三个劳改犯偷了队部的两套制服，穿了冒充干部。另一人反绑了双手，扮作犯人，还伪造了一封公函，偷盖了队部的印章，假装成两名干部押送一名犯人去县城。在通过一道关卡时因为伪造的公函不合格式被识破而逮捕，押回场部处理。不久以后这三人被判死刑，有一天下午在分场北面空地上执行枪决。所有劳改犯都不出工，强制每个劳改犯必须去参观这法场。三人中有一人是个大学生，长相很神气，是大队的勤务犯，经常出入队部，所以有机会偷队部干部的衣服和私盖印章。执行枪决前先宣判，宣判时那三人反绑着站在临时搭起的宣判台前，昂然举首，毫无惧色，想是他们对此结局早在意料之中。宣判后随即押到人群外的空地上枪决。在劳改队甚至农工队，强制去看枪毙犯人是常有的事。刑场四周岗哨密布，架起了机枪，场里场外到处是杀气腾腾的标语，充满了恐怖气氛。劳改犯们对这种场合，确实心惊肉跳，感到害怕。

在这次奖惩大会开过后，劳改犯的情绪大为低落，体会到减刑无望，加刑却大有可能。以前在监狱中判刑时，判死刑自不必说，至于一点小事便判刑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稍为严重些的事便判无期或死缓，当时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至少是不会当真。但至今一看，却是货真价实，毫不含糊。减刑和提前释放等想法是天真的妄想。我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苦闷加深。心想等我刑满时已年近半百，家人恐都死光。况且这样苦难的劳改生活，怎样能长期支持下去？于是也产生了逃跑的念头，而且这念头从此时常在我脑中萦回，盘算着什么时候逃，怎样逃，作什么准备等等。

经反复考虑，我决心单独行动，决不结伴。因为任何一个我认为可作同伴的人，都有出卖我告发我的可能，这个危险比逃跑中所能遇到的危险更大。我认为整个中国如同一个大监狱，即使逃出了劳改队，到了社会上还是在政权的手掌之中，还是在专政之下，还是无地容身。当时共产党和政府的宣传中所谓“人民的巨掌”即意味着反革命犯难逃法网，事实也确是如此。只有逃出国境，或许还可有出路。如走港澳这条路，不但路途远，而且我一身褴褛，形容枯槁，既无钱又无证件，恐怕一出劳改队范围便会被识破，因此摒弃走这条路的计划。想来想去只有从海上逃走。

分场地处苏北沿海，离陈家港只有不到十公里，我曾去过那里运回山东大萝卜。那里人烟稀少，海面广阔，靠海是大盐场，连人影也看不到，是个脱身的好地方。我准备在临走时把枕套和被面拆下，到伙房去偷剩饭装入枕套作干粮，乘黑夜逃到陈家港找一块木板，一根竹竿或木棍，抱着木板在海上漂流，竹竿支起被面作帆。据我所知，苏北海岸的东面是朝鲜半岛的南部，东南方向是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最远也不过几百公里。如遇顺风，至多不过十多天便可到达彼岸。时值盛夏，泡在海水里不至于冻死。我会游泳，再加抱了一块木板，也不至于淹死，有一袋干粮也不至于饿死。想到这些我感觉大有可为。

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在观望和伺机行动时，忽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我的计划是在顺风的假设下拟订的。如碰不上顺风，甚至碰上逆风怎么办？我国气候夏季多东南风，正好与我要漂流的方向相反，非但漂流不到海外，恐怕连海岸线也出不去。冬天多西北风，风向是对头了，可是泡在冷水里要冻死。想到这一问题我心冷了下来，勇气全消。然而我在此后几天中，仍旧注意每天的风向，有时是无风，有时是微风，有时风势略大，但都是东南风，没有西北风。我的逃跑计划只好打消，打消后的心情可说是心灰意懒，痛苦绝望。

## 创伤

就在这段时期，我不幸发生了一桩工伤事故。有一天中队派我出公差，到住所后面空地上去铲草皮开生荒，辟建菜园。铲草皮是很不好干的任务，必须用海门县生产的土镢才能铲得起草皮。

那海门镢很重，钢质镢头有四十公分长，只有十公分宽。镢口磨得飞快，闪闪发光，两边突出尖锐的角，中间凹进去，成月牙形，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古代的兵器，有些吓人。生荒地的草皮尽是草根，密得像编织物，一般宽口的钝镢是铲不动的。用土镢下镢时，必须先把它提高，然后用力一下猛甩下去，切断草根，这样才能铲起草皮。我由于慢，落后于别人，怕受责备或处分，努力追赶，不料往下甩镢时用力过猛，身子一晃动把镢的一个



锐角砸入自己的左脚背上，一阵剧痛，不禁大叫一声，站立不稳，跌倒在地。

别人听到我的叫声跑过来看我出了什么事。见我躺在地上，满脚是血，便把我抬到医务所。犯医立刻设法为我止血，用绳子把我的小腿绑紧，但血仍涔涔不断地流出，地下滴了一片血，过了好一会儿才停止。然后犯医把伤口洗净，消毒后包扎起来，包得很厚。我问：

“为什么包得这样厚？”

他说：“为了防止空气中细菌侵入，发生感染，得了破伤风是很危险的。”

然后别人把我抬到工棚中我的铺位上。到了晚上，痛已减缓，但因流血过多，感到头晕，昏昏睡去。当夜梦中醒来，受伤的左脚痛已停止，但感到发虚，是一种我从未经受过而且是难以形容的感觉，比痛更不好受，那只包得厚厚的脚怎么摆都不对劲，一夜翻来覆去不得好睡。

第二天犯医来看我，对我说：

“队部已批准你一个星期病假，你安心休养吧，过两天到医务所来换药。”

我听了心中一宽。当时还在反右开始之前，队部批假较宽，对犯人也不太严厉和敌视，否则像我那样的病情批假一星期是不可能的。随后两天左脚发虚的感觉逐渐消失，夜里睡眠较安。第三天到医务所去换药，仍是由别的犯人搀扶着去。那时脚上包扎的棉花和纱布已浸透了血液，血液又已干结，整个脚如同禁锢在硬壳之中。我便自己动手解纱布，犯医立即阻止我。他说：

“你就这样去解掉纱布要牵动伤口，已接上口的血管会脱开，你的脚就难以保住了。你不要管，让我来。”

随后他去大伙房烧了一壶水，叫我把脚放在盆里。他用杯子把热水慢慢地浇在我脚背上，干结的纱布溶化松开，最后全部解完，一点也没有牵动伤口，一只脚露了出来。我一看吓了一跳，脚的前部大半截连脚趾完全变成黑紫色，只剩脚后根还是白色。犯医对我解释说：

“血管被切断，血液不流通，淤死了。但伤口已愈合，以后血液流通了，淤血便会消去，黑紫色便会退掉。可是如果退不掉，说明血液不流通，组织坏死，那你的脚只有截掉了。”

我听了很恐慌。假如成了残疾，今后生活上将多么不便和痛苦。继而一想，或可因此避免无止无休牛马般的劳动，未始不是“塞翁失马”。人到这种地步，患得患失思想特别严重，有时竟会超出常情，这种想法与“新丰折臂翁”有类似之处。这样一想，对于自己的脚是否会残废倒处之泰然，不很在意了。

一星期的假很快就到期了，可是脚伤未好，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劳动的情况。

事有凑巧，大伙房运到了一大批山东萝卜，需添加二个人去切成条，腌制咸萝卜干。经犯医推荐，我被选中。这工作不需走动，只是坐着干，对我这伤脚的人很适合。这工作干了近一个月，伤口全部愈合，除略感生硬外，已可走动，并未残废。

在这次事故中我碰上几件侥幸的事：一是受伤地点离医务所很近，受伤后很快便被送到医务所进行急救，止血及时，没有耽误；二是当时犯医和护士都在，就医者又少，及时治疗，未受干扰；三是在一起劳动的同犯间能互相同情，互相协助，我受伤后别人极为主动地帮我不少忙，否则情况恐怕不会这么顺利；四是犯医和我很熟，常在一起谈天下棋，可称难友，因此他能为我精心治疗，又为我争取较长的病假和大伙房轻劳动，我的脚才能在较短时间内痊愈。他姓寻，是很稀少的姓，所以我至今没有忘，我对他也感激至今。

我的左脚虽未致残，但到底受了重创，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内，经不起走远路或挑重担，一遇用力过度便隐隐作痛。这一情况延续了几年之久，体力也因此下降，苦头吃了不少。而大脚趾旁的“草鞋骨”因此骨质增生，逐渐大起来，凸出来，成为明显的畸形。这畸形留下了劳改苦难生活的遗痕，看到它常会勾起我痛苦的回忆。

## 阴谋暴动集团

季节既已入伏，工种也很少调动，较以往固定。每天除拉犁开荒外不做其他劳动。这对劳改犯来讲，是件极为苦闷的事，在极其艰苦的劳动中自然会产生思变的心理。

出乎意料，有一天大队召集开会，宣布新订的作息时间表，并强调政府的劳改政策是劳动生产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伟大政策。最后全体起立，由干部带头高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会到此结束，宣布散会。

回到中队，中队长又讲话，大意是过去由于劳动任务紧迫，要限期完成，着重了劳改，放松了学习。现在新的作息时间表已制订，每天收工后要抓紧时间吃饭，饭后中队点名，总结一天的工作情况，对表现好的要表扬奖励，对表现不好的要按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斗争、检讨、警告、记过、关小号以至加刑。点名后立即开始学习，从七点到九点，必须保证两小时。学习内容包括政治时事、国内外形势、毛主席著作、劳改政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比、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等等。学习方式是上大课、听报告、读文件和报纸、小组讨论、做学习笔记和心得、互相帮助、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对坏人坏事检举揭发，当面或公开地、秘密或私下地均可等等。

实行新的作息时间表以后，劳动时间虽稍缩短，体力负担虽稍减轻，可是学习时间延长，犯人们又须在学习会上互相攻讦，精神负担却大大加重。每晚学习时大家都累得坐都坐不住，只想躺下睡觉，却还要端坐讨论和发言。我那时任学习组长，还要做每人的发言记录。干事和队长轮流来监视，毫不放松。与此同时，大队发下了歌谱，由劳改犯中懂音乐的人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歌词我已记不全，其中有一首是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词意是劳改犯应该感谢共产党对大家的再生之德。每次开饭前必须唱这首歌，唱完后才能开始吃饭。这与基督教徒在饭前做祷告有类似的用意，无非是为了表示对共产党毛泽东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此后的一段岁月，既没有编队或调动，劳动项目和工作又比较固定。全场劳改犯除勤杂人员搞菜园、修建房屋、整理卫生、医务工作和伙房外，其余全部投入拉犁开荒。一直

到了翌年春天，据说全场已开了三万多亩地。那时有几辆拖拉机调来耙地，劳改犯不再开荒，转入把开过后并经耙过的地进行平整和开沟，做播种棉花的准备。就这样进行了约两个来月，时令进入初夏，天气已很热，部分劳改犯已开始播种。

有一天早饭后，劳改犯正要出工，忽然队部传来通知，那天不出工，分场开大会，并叫大家开会前预先大小便，进入会场后便不许再出来。随后看到勤杂犯们拿着大批标语、横幅、竖联在各处贴，内容大抵是“粉碎反革命暴动组织”、“打击反改造分子”、“坚决消灭人民的敌人”、“严厉打击暴动分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检举揭发，不让一个漏网”等等。同时在分场四周隐约可见无数解放军士兵已在放哨。这种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好比大祸临头，思想立即紧张起来。劳改犯们也都在窃窃私语，不知是怎么回事，感到惶恐不安。不久通知大家集合，排成双人行列，到场部北面的空地上去参加大会，是什么会还是莫名其妙。

当我队到达时，别的队大多已经来到，成行地坐在地上。会场一端，已用木板搭起一座台子，台上张贴了许多横幅、竖联和标语。我队来到较晚，坐在离台较远处。台上坐着很多干部，其中不少是生面孔，猜想是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和党委方面的大人物。由此可知这次大会的严重性和当局对它的重视。随后会场中响起了高呼口号声，口号的词意与标语基本相同。队长和干事命令我们随着喊，喊时要高举右臂。一时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手臂如林，忽起忽落，声势吓人。

在此同时，会场四周，逐渐布满了解放军，持枪监视。台子的左右也站了许多公安部队。在这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中，台上的干部用扬声器宣告大会开始，随即有另一名干部开始讲话。大意是分场侦破了一个反革命阴谋暴动集团，它已发展成庞大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企图暴动。骨干分子有数十人之多，目的是抢夺武装人员的枪支弹药，杀害干部，焚烧仓库，并准备流窜到各地接纳社会上潜存的反动分子，扩大声势，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他们中的首要分子在去年春节期间，已开始活动。政府几乎就在同时掌握了他们的活动情况，但是不动声色，没有立即逮捕他们，只是严密地监视着，主要是为了进一步

掌握全部同伙的人，因此任其发展，扩大组织，到一定时机，政府便可把他们一网打尽，免有漏网，遗留后患。现在政府根据客观情况，认为时机已到，无须再等，因此召集这次大会，当场当众把反革命阴谋暴动组织的为首骨干分子立即逮捕。接着，大声叫：

“某大队某中队某小组某某某站出来！”

随着这一声点名，武装人员和干部多人立即把这人从小组中揪出来，反铐着双手拖到台前。就用这样的方式，一个接一个的人被点名拖到台前，一共有十多人，排成一列，反铐着双手站着。这时会场虽有数千人之多，却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反映了在场犯人们紧张和沉重的心情。当局这一行动意味着瓮中捉鳖，被叫到的人束手就擒。

当时我认为会上宣布这些人的滔天罪行，是否真实，很可怀疑，至少是有渲染和夸大。在点名揪出了阴谋暴动集团的十余名骨干分子后，大会约有几分钟的沉寂。台上的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看来很紧张，台下仍是肃静无声。

随后那干部接着讲话，大意是当众逮捕的这十多人是暴动集团的首恶分子，是人民的死敌，是劳改队中的害群之马。他们不自量力，妄图翻天，他们的下场你们是可以看到的。至于这集团的次要分子和受了拉拢或诱骗的胁从分子，政府已掌握材料，但现在暂不逮捕，看你们有没有真诚悔改的决心，能不能自动坦白自首，并进一步检举揭发与此案有牵连的人。不要以为你们的问题并不严重，只是党和政府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对你们做到仁至义尽，你们要认清形势和政策，相信政府，用实际行动来自救救人。话讲完后，宣布把那十多人押走。于是武装人员把那十多人除反铐外还加五花大绑，拖上两辆卡车，由武装人员押走了。

接着，又有分场管教干事讲话，布置各大队回去学习和讨论的主题和进行方式。主要是要犯人们互相监视，每人要仔细回忆过去和现在看到听到的可疑人物和事情，向队部检举揭发等等。大会开到过了中午，四周包围着会场的解放军和台前的武装人员陆陆续续撤走，犯人们按次序退出会场，回到各自的中队。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遂告结束。可是犯人们惶恐不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晚上中队又召集开会，指导员按照分场大会报告的精神布置各小组学习，以破获暴动集团为主题展开讨论，每人必须发言和表态。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继而进行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指导员强调，在检举揭发中不必存在顾虑，恐怕打击报复，政府对检举人是绝对保密的。对有功的人，还要奖励。你们要大胆怀疑，不要怕冤枉好人。政府对检举材料要严格核实，在办案中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下坏人。

最后他告诫大家：已被逮捕的十多人，在政府严密监管下，为了自救和争取宽大处理，必然会写坦白和揭发材料。你们中间凡参加他们的组织，或与他们的犯罪活动有牵连的，要采取主动，赶快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切勿犹豫。如果他们先揭发了你，那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就要逮捕你，从严惩处，决不宽待。到那时你就后悔莫及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去何从，你要及时做出决定。

这一阴谋暴动集团的侦破和大会当众逮捕首要分子的场面，充满了恐怖色彩，使我心情紧张，惶恐不安。可是由于此案与我无关，多少存在“隔岸观火”的自慰思想。但是在这次中队指导员讲话之后，我产生了顾虑。原因是那被捕的十多人之中，有一人可算与我相识。这人姓费，身材矮小，面目清秀，两眼灵活有神，显然是个聪明机智的知识分子，是我苏州同乡。我和他相识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收工，在归途中我正和同组同乡人孙某用家乡话交谈，旁边走近一人问我：

“你是不是苏州人？”

我说是的。他又说：

“我听你讲的话带有苏州口音，所以猜想你是苏州人。我也是苏州人，我们是小同乡。”

就这样我俩便搭讪起来。他告诉我他的姓名，又问我姓名，我如实相告。我忽然想起我家乡费家是个望族，与我家是世交，便问他：

“有个费某某是不是你一家？”

他说：“是的，他是我的远房伯父。”

此后在收工时又遇到了他一次，谈了些彼此的年龄、学历、经历、案情等以及家乡的

一些情况，除此之外其它的事都未谈。一方面由于时间短促，无暇长谈，一方面我自失言受警告和写检讨之后，在谈话中十分警惕，不多谈关于自己的情况和思想，更不敢表露自己对政治时势的看法和见解，所以尽量少讲话。在这两次交谈以后，彼此再未会过面。

由于不属于同一大队，住处和工地都不在一起，遇见的机会是极少的。糟糕的是彼此已互通了姓名和其它一些情况，已可算是相识。现在他既已作为暴动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捕，正在关押审讯中，当局对他绝不会轻易放过的。由于刑讯逼供或他本人想要坦白自救，很可能把我也拖下水，作为他检举立功、表示悔改的材料。而且他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案由以及我的外形和面貌等等，办案人哪有不深信之理。我将有口难辩，无从解脱，后果不堪设想。我这样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非常客观和现实的。为此我思想上起了激烈的斗争：我是否应该主动交代与他两次交谈的经过？以免被他先检举我，使我处于被动地位。继而一想，我和他即使算是相识，但既未参加他们的组织，又未参与他们的犯罪活动，对他们的罪行一无所知，有什么交代的必要！而且自己不可过于心虚胆怯，自找麻烦，否则将会更坏事。经反复考虑，打消了主动交代的想法，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当然思想仍然十分焦虑，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心中好似怀着鬼胎，一刻也不得安宁。

此后过了一个多星期，分场又召开大会。情况与上次大致相同，同样充满了恐怖气氛，但我感到更为紧张。因为上次大会是突然召开，大家思想上并无准备，也不知是什么事。这次大会，已知是为一件极为严重、极为可怖的案件召开的，大家的心情更不能平静。对我来说，这次大会比上次更为可怕。如果那费某检举了我，诬陷我为同谋或胁从，我就有被揪出来束手就擒的可能。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的政策下，在自供中，故意扩大自己的罪行以求从宽处理和诬告无辜、拖人下水以求受奖的事例，不计其数。

大会开始后，仍是高呼口号，然后有一干部来讲话，好像不是上次讲话那人。大意是上次大会以后，各大队的犯人，以彻底粉碎阴谋暴动集团为题，展开了讨论会，进行了坦

白交待，检举揭发。有一部分参与者和胁从者提高了认识，相信政府，放下包袱，主动向政府交待自己的问题，这很好。对这些人政府肯定会从宽处理或不予处分。可是还有一些积极参与者和胁从分子，顽固不化，至今不主动交待，抱着抗拒到底的态度。他们也许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其实政府对于他们的罪恶活动，早已一清二楚，现在就把这些人点名逮捕，随即大声高呼：

“某大队某中队某小组某某某站出来！”

一声令下，武装人员和干部多人立即把这人从人群中揪出来，反铐了双手，拖到台前，情况和上次大会一样。逮捕了八九人后停止了。我本来非常害怕，心中直跳。在进行逐个逮捕时感到好像立即要叫我的名字，结果总算幸免，心中大为宽慰。

接着，那干部声明：“政府对犯人的量刑有两个标准，一是看罪行的轻重；二是看坦白或抗拒的程度。有的犯人罪行虽重，但能彻底坦白，有悔改表现，得到从宽处理。相反有的犯人罪行虽不很重，但死不坦白，顽抗到底，结果从严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政府英明的政策，永远不变。今天逮捕的这些人是你们有问题的人的前车之鉴，望你们不要步他们的后尘，要从这两次大会中得到启发，凡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务须及早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然而政府不会等待太久，有一定的期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切不可错过时机。否则必自食其果，后悔莫及。”大会结束时已近日落。

上述这类性质的话，自我被捕以来，不知听过多少遍，按说是应该听腻了，厌烦了，不会起什么作用。事实上绝非如此，每次听到，毛骨悚然。因为这些话决不是空话，政府确实是按它执行的，这些话关系到每个被捕者生死攸关的命运。再者这些在大会上被逮捕者是早已被逮捕的人，可说是“逮捕中的逮捕”，恐怕是古今中外司法界所绝无仅有的现象。

第二次大会开过以后，我的思想负担减轻了，心情轻松了许多。那费某没有拖我下水，实属大幸。我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能顶住威逼利诱，不诬告无辜，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魄，他参加或许是发起组织暴动集团，就说明他不是个胆小的弱者。我在当时虽未被牵连进去，但顾虑还不能完全消除。这案件还未定案，审讯和侦查仍在进行，费某也仍在



监押中，经无止无休的逼供和他本人不断的思想斗争，难免还会检举我作为同谋或胁从，还不能断定从此就没有我的事，可以逍遥自在了。正如中队长曾说过：

“对于这个阴谋暴动集团，政府决心要把它彻底粉碎。把所有一切主犯、从犯一网打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有一天我因病在工棚休息，没有出工。我的铺位在工棚的一头，还有一病号睡在工棚的另一头，相距有三十多公尺，其他劳改犯都出工了，工棚中空荡荡的。有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穿着制服，拿着公事包，从另一头走进工棚。他先和那头的病号交谈，不一会儿他走过来，到了我面前，问我为什么没有出工。我说我是病休，并随手把病假条给他看。原以为他是场部的干部来检查出勤情况的，可是他摆了摆手，表示不要看。接着，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案由等等，我一一据实答复。他接着说：

“你判了十二年徒刑能出来劳改，是不幸中的大幸。按原来的政策，凡判十年以上的犯人都要镇压的。后来政府以治病救人为宗旨，政策改变了，宽大了，把本要处决的人判处有期徒刑，投入劳改，以观后效。你应该感谢政府，努力劳动，认真学习，痛改前非，走上自新之路。”

我听了无话可说，只是唯唯诺诺而已。至此他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交谈结束后他便走了。我心中很纳闷，为什么这干部对犯人的态度会这样温和？而且透露给我这样机密的信息？一般情况下这种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可能他是出于同情心，目的是为了宽慰我，鼓励我好好地劳动改造。至于他所说政策宽大是为了治病救人，给本来要镇压的犯人判处有期徒刑，是给以自新的机会，好像是说党和政府在施仁政，能为犯人着想。这是好听的谎言，与我亲历的情况和所见所闻不相符合。诸如罗织罪名、诬陷无辜、大逮捕、兴大狱、大屠杀等等哪一项可算是治病救人，哪一项可算是仁政？

据我猜测，如果那干部所说政府把原来要判死刑的人，判处了有期徒刑这一点属实的话，可能是共产党掌权不久，有不少紧迫艰巨的工程，诸如兴修水利、建筑公路和铁路、开发矿藏、开垦荒地等，正可利用劳改犯的无偿劳动力去进行，从而获得高额的经济效益，

比枪毙他们更为有利。

后来听人传说，上海市监狱派人来调查上海市大队劳改犯的情况。我暗自估计那来工棚和我谈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知道上海市监狱的情况，自然不足为奇了。这一段经历使我思潮起伏，在无法纪无人权的专政体制下，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常系于掌权者一念之差，真是悬而又悬。我本想把这信息告诉与我相好的犯人，但恐怕传到队部，又要惹事生非，这件事非同小可，政府定要追究，非但会引火烧身，还要连累那好心的干部，因此我缄口不言，始终没有透露给任何人。

盛夏过去，新秋来到，那阴谋暴动一案暂时沉寂，但是未结案。对被逮捕的两批重犯仍未处理，仍在审讯之中。据干部们讲还要深究，以达到彻底肃清，从而我的担心也仍未解除。有一天大队召集开会，宣布有一批犯人将调往西部去筑铁路，接着宣布名单，我的名字居然在内。这对我来说可谓天大的喜事。因为我能调走，说明我与阴谋暴动一案没有牵连。心中一直悬挂着的石头才算放下，感到无比轻松和高兴。至于西部筑铁路是什么情况，我一无所知，也根本不去考虑。在这里当着犯人枪毙逃犯，当着犯人逮捕阴谋暴动分子，不断地开批判斗争会，持续地逼迫犯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等种种造成紧张恐怖气氛的做法，使犯人们人心惶惶，终日不安，我能早日脱离这个鬼地方，避开这可怕的环境，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资 料】

##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1月30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东方红，太阳升。举红旗，望北京。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我们，永远忠于您的河南五千万人民，满怀革命豪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地诞生了！

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您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建的丰功伟绩！

辽阔中原，欢声雷动。在这欢庆的日子里，千万颗红心飞向天安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地祝愿您啊，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那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把我们的心坎儿照亮，是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奔向胜利的前方。打开河南人民的革命史册，哪一页不凝结着您伟大思想的光辉结晶！回顾河南人民的战斗历程，哪一程不闪耀着您革命路线的万丈光芒！

是您，统帅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磅礴气势，飞渡黄河，直捣中原，结束了“水、旱、蝗、汤”四害交加的悲惨岁月，使灾难深重的河南人民获得了解放。

是您，在欢庆土地改革胜利的锣鼓声中，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战斗号令，激励着我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

是您，在我国农村两条道路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高度赞扬了河南安阳县南崔庄共产党人“坚决地支持合作社”的革命精神，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给中国赫鲁晓夫当头一棒，为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撑腰，鼓舞着五亿农民沿着您指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迅跑。

是您，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苦战二年改变面貌的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七亿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迈开大跃进的步伐，迅速地改变着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是您，在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刚刚诞生的时候，亲临河南农村视察。您以无限喜悦的目光，关注着人民公社这生机勃勃的幼芽，指出：“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是您，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河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您的率领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世界革命最天才的舵手。是您的光辉思想，哺育着世界革命人民战斗成长；是您紧握时代的舵轮，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领航。

正当苏联赫鲁晓夫的魔爪熄灭了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中国赫鲁晓夫妄图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时刻，是您，眼观世界风和雨，天安门上举红旗，以高度的智慧，惊人的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

方法和政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光辉航程。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我们响应您“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怀着对您的赤胆忠心，凝聚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摧毁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设置在河南的反动堡垒，打倒了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您的恩情深。毛主席啊，毛主席！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导。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您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一致，坚决执行您的战斗号令，为河南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一九六七年七月，您对河南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翻了身。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您亲临河南，调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出了一系列最新指示。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您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焕发，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气腾腾。全省人民齐声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高地举起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您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

面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您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言行一致，学用一致，学了就用，说了就做，让您的最新指示在条条路线上全面开花，在中州大地上结满累累硕果！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以您的光辉思想为武器，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认真学习您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各级党的组织建设成为“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大规模地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和帮助解放军。加强军民团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响应您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夺权，靠的是您的光辉思想，掌权和用权也要靠您的光辉思想。我们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孜孜不倦地读您的书，老老实实在地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忠心耿耿地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要心怀一个“忠”字，突出一个“用”字，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好思想革命化。我们誓把河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中原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前哨，定让您的伟大思想红遍全球！

蓝天白云寄丹心，春潮红浪谱乐章。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资 料】

##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2月3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春天，战斗的春天，将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春天。

今天，守卫在您身边的河北四千三百万英雄儿女，怀着无比的喜悦，无限的深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喜：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您的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号角声中，胜利诞生了！

燕赵原野春雷动，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华北地区红成一片。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心脏地带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必然使全国的大好形势好上加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更加不可阻挡地奔腾向前！

毛主席啊，毛主席！看长城内外，红旗如林；海河上下，人潮似海。在这凯歌高奏，万众欢腾的大喜日子，我们河北英雄儿女，怎能不心潮澎湃万感集，热血沸腾喜泪流。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滔滔海河水，容不下您对我们的深厚恩情；巍巍太行山，载不起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万语千言，千歌万曲，汇成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久经战斗风霜的河北人民，怎能忘记您率领我们渡过的战斗岁月，怎能忘记我们跟着您跨过的万里征程！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率领红军北上，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是您用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武装了我们，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人人奋勇争先。在太行山上，白洋淀中，青纱帐里，地道内外，无数的英雄儿女，布成了游击战争的天罗地网，创造了旷古未有的壮丽史诗，最后配合各解放区军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烧焦焚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以古今中外无以伦比的胆略与天才，指挥着伟大的解放战争。继清风店大捷之后，您指挥我们迅速攻克石家庄。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您又亲自指挥了伟大的平津战役，使战略决战任务胜利完成。从此，“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解放。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您高瞻远瞩，向全党全国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途径，及时地提出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您的不断革命的伟大思想，把全国人民从胜利引向新的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掀起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滹沱河畔，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革命行动，您指出是“五亿农民的方向”；燕山南麓，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的革命精神，您称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全国“六万万穷棒子”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伟大祖国天变地变人更变，山河处处换新颜！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那全国大跃进的年代里，在渤海之滨，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您迈着巨人的步伐，视察河北，走遍全国，“阅尽人间春色”。锦绣河山气象万千，三面红旗永远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那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群魔乱舞，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的严重时刻，又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宣布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令，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敬爱的毛主席，您和河北人民心连心啊！在我们同百年罕见的洪水英勇搏斗的日日夜夜，您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亲手绘出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如今，稻菽涌起千层浪，海河两岸尽朝辉！当我们遭到千年不遇的地震灾害的时候，您又派来了亲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万人宣传队，帮助和鼓舞我们战天斗地，奋发图强。

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日您老人家亲！忆过去，不是您的英明领导，我们广大的劳动群众，怎能挣脱苦难的深渊？！不是您的思想哺育，我们怎能在战斗里锻炼得如此坚强？！不是您指引的方向正确，我们怎能绕过一个个的暗礁，度过一道道难关，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项成就，每一个胜利，都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永远紧紧跟着您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方！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河北省的土地上翻滚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风烟。中国赫鲁晓夫和河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妄想河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刮起一股黑风妖雾，把什么“发家致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黑货都拿到这里一些地方来扩散。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便是在这里炮制，从这里出笼，流毒各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野心勃勃，罪恶滔天。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明察秋毫，识破了中国赫鲁晓夫一伙阴谋家的狼子野心，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河北英雄儿女，紧跟您的豪迈步伐，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揪出了长期盘踞我省的一小撮走资派。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迫不及待地抛

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制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坚决响应您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誓死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穿迷雾，绕暗礁，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使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毛主席啊，毛主席！正当我们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乘“一月革命”的东风，高举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的战斗旗帜的时刻，河北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又爬了出来，造谣诽谤，挑拨离间，颠倒是非，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您的伟大战略部署，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您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洪流岂容阻挡，历史车轮怎能倒转？！在这决定胜负的关头，您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作了一系列极端重要的指示。您的最新指示，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无尽的智慧，无限的勇气。我们心更红，眼更亮，志更坚，胆更壮。在同阶级敌人反复较量的激烈搏斗中，我们越战越强，捍卫了您的革命路线，击退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结成了更加雄伟的长城。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河北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从太行山麓到渤海之滨，从燕山脚下到漳河尽头，“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迎风招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浪潮风起云涌，学习您的光辉思想的学习班如雨后春笋。工业战线频传捷报，农业生产获得特大丰收。河北四千三百万英雄儿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牢固坚强。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但是，“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但是，用您的伟大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根本的根本，关键的关键。我们要更深入、更广泛地掀起活学活用您的光辉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兴革命的学风。以您的最新指示为指针，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五篇”为座右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让“私”字扫地出

门，建立起“公”字长城。我们一定要下定最大决心：把河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倒、批臭。我们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我们要整顿党的组织，加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装的党的建设，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去占领一切阵地！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您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坚决执行，字字照办。我们河北省地处祖国的心脏，在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周围，是保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要地。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力争把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使河北千里原野，成为保卫您、保卫首都的最坚强的红色屏障！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要“拥军爱民”。我们一定高举拥军大旗，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和帮助解放军，百倍警惕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遵照您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的新秩序，保卫新诞生的革命委员会。对一小撮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扰乱社会治安的阶级敌人，不论在幕前或幕后，我们都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打击！

革命的长河，汹涌澎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毛主席啊，毛主席！世界已进入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您是真理的代表，黎明的曙光，人类的救星，世界的希望。在您的思想鼓舞下，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前程似锦，人类前途灿烂辉煌！我们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这盛大的

节日里，我们河北四千三百万英雄儿女向您庄严宣誓：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您的伟大思想永不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您的路，我们走定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群众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永远走您的路，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读者来信】

#### 1. 孟繁华纠错

李富春五点指示第四点中的“赵承来”应为“赵承丰”。■

#### 2. 聂树人回应肖文正

肖先生对敝文的考证，虽然搞错了对象，但是，认真的态度可嘉。而且，它帮我们搞定了一个问题——1966年10月6日大会上，宣读《给全国人民的通电》的是蒯大富。当年的大会，确实有《给全国人民的通电》。这个通电，就刊登在《首都红卫兵》报上。

由此也证实了，《清华蒯大富》一书的作者许爱晶先生，对于10月6日大会上蒯大富读“誓词”这一情节，是货真价实的编造（他编造的情节，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痛斥的是编造！如果对编造者不痛斥，中国的回忆文坛，不就成了垃圾世界？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欣赏肖文正先生下面这段话：“回忆文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不要匆忙下结论，更不能用不恰当的言辞对待与自己说法有差异的人。希望亲历者们心平气和，认真考证，共同努力，给世人提供尽量准确的历史文献。希望《记忆》成为弄清历史重要细节的平台，避免那种攻击漫骂的无聊文章！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另：

1、肖文正引用的关锋讲话中，说，蒯大富念的是“通电”，而不是“誓词”。因此，牛头不对马嘴。

2、唐振权教师说我1967年3月主持了《东方红报》会议，是他记错了。我当时在红代会工作，3月下旬才回到学校，4月3日才当上常委。那会议是其他人主持的。■

### 3. 聂树人回应七尺从天

七尺从天，你在《记忆》上发表的《聂树人批聂元梓“北大武斗”造假考》一文，看到了。你指责我说，聂元梓写的1968年3月，“地派”多个院校到北大武斗，说的不对，“时间对不上”（大意）。是这样吗？你引用《北京大学记事》，写的是3月25日。而我引用的是“1968年4月11日该报（指当年出版的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刊载的一份来自《东方红公社》总部的声明。声明说：“资产阶级政客聂元梓、孙蓬一之流，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转嫁危机，逃避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公然挑起武斗，毒打我两名到北大刷大标语的东方红战士，甚至无耻地假冒新北大井冈山的名义，向我院和其它院校打电话，欺骗我们出车派人去北大，阴谋拉人下水。然而，我们识破了其阴谋，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就借助于造谣诬蔑的流氓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贴标语、散传单，反诬我东方红战士到北大挑起武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3月25日与4月11日，时间当然不一样。但是，以4月11日写3月25日，有什么不可？不知道错在哪儿？不知道你指责我什么？请指正。

又，《北京大学记事》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你为何不向它问个为什么？对于聂元梓造的这次“事件”，我是当事人之一，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她说的那些事情；我也向《东方红报》问过为什么，它出版于1968年4月11日，白纸黑字，21世纪，为我亲眼所见。■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傅青竹

本期校对：顾宁人